



六盘山

论坛

◆ 宁夏六盘山干部学院
◆ 中共固原市委党校

2024 / 04
总第72期

坚持为党育才、为党献策 充分发挥党校的独特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校始终不变的初心就是为党育才、为党献策。”党校作为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主要方面军，是推动党员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升理论素养的地方，必须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不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充分发挥为党育才、为党献策的独特价值。

提高理论教育宣传精度。传播党的创新理论，必须重视不同群体和个体的理论需求，找到其关心的新问题真问题，有针对性地答疑解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对干部的教育培训，针对干部的知识空白、经验盲区、能力弱项，开展精准化的理论培训、政策培训、科技培训、管理培训、法规培训”。党校要全面加强干部教育培训班次、学制和学时要求规范化建设，摸清底数情况、细分培训对象、明确学时要求、设置对应班次、规范工作标准、加强考核评估。提升培训内容精准度，上好理论铸魂课、专业训练课和实践锻炼课，让不同的党员干部都能学有所获、学有所得，推动党员干部做好党的创新理论的深化内化转化工作。推进传播方式精准化，针对不同受众开展多层次多样化理论宣传，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生动鲜活的事例、接地气的表达，面向干部群众打造融媒体宣传矩阵，把党的创新理论与干部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内容讲清讲深讲透，不断增强干部群众对党的创新理论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

注重理论研究阐释深度。马克思指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理论研究成果只有鞭辟入里、严谨透彻，才能真正触动人们的思想和灵魂，让人“解渴”、引人共鸣。党校要在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研究和学理化阐释上下功夫，把彻底的理论讲彻底，把鲜活的思想讲鲜活，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要发挥党校学科专业优势和人才集聚优势，形成研究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高质量成果，帮助干部群众从党的创新理论中悟规律、明方向、学方法、增智慧，从而自觉运用党的创新理论这一强大思想武器分析、理解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的实际问题。

加强解决实际问题效度。理论的价值在于指导实践，学习的目的全在于运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运用党的创新理论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满足人民需要、解答时代问题，在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实践上发挥重要智库作用。围绕重大主题，构建党校、社科联、高校、社会智库等联合调研、集体攻关、协作献策机制，进一步提升决策咨询的专业化水平。充分发挥党校系统平台优势，采用入户走访、座谈调研、建立联系点、大样本抽样调查等多种方法，直接、有效、可信地从基层一线获取群众意见、民生需求等真实信息，为科学民主决策提供专业化的对策建议。充分发挥学员资源优势，以多种形式推动学员参与课题研究，将学习成果和工作思考转化为谋划推动工作落实的思路和举措。

《人民日报》（2024年12月18日 第9版）

杂志编委会

编委会主任：杨继宏

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东升 王平花

王桂贤 徐万廷

黄玉红 雷宁

主编：徐万廷

副主编：王平花

编辑部主任：孔晓

责任编辑：鲍淑红 金立叶

陈宝华 单娟娟

主办：宁夏六盘山干部学院

中共固原市委党校

编辑出版：《六盘山论坛》编辑部

电子邮箱：lpslt@126.com

印刷：固原萧关印刷有限公司

CONTENTS

目录

○卷首语

坚持为党育才、为党献策 充分发挥党校的独特价值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P01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重要论述研究

包毅

P07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与传统生态观的关系及价值研究

高田

理论探索

P16 西吉县悬赏捕猎野猪的做法与启示

龙生平

P23 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徐兴红 刘婷

P28 新时代共同富裕的内涵特征与实现路径

张婷

萧关艺园

P34 萧关艺园

延安精神研究

P36 文化自觉与文化反思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党文化的形成路径选择

袁磊

探索实践

P45 推动基本培训落地落实的意见建议

魏杰

P49 固原市关于进一步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对策建议

邵菁 马宁等

P52 关于深化固原市生态旅游特色市建设推进机制领域

改革的对策建议

罗江东 柳睿等

宁夏党史研究

P56 莲花沟，长征路上一条通往胜利的红色通道

苏明珠

P60 《六盘山论坛》征稿启事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 重要论述研究

◆ 包毅

摘 要：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足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孕育兴起的历史契机，把握我国高质量发展阶段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趋势，力求在未来发展和国际竞争中塑造新的战略优势，具有鲜明的时代背景和问题意识。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明了新质生产力的丰富内涵，深入剖析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大现实意义，明确提出了新质生产力理论框架，正确揭示了新质生产力与高质量发展之间内在逻辑联系，系统论述了新质生产力的实践路径。这一系列重要论述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上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中国化时代化发展，为以先进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复兴开辟了现实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指引意义。

关键词：习近平 新质生产力 高质量发展 实践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从推动高质量发展全局出发，提出了一系列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形成了新质生产力理论，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又一新的理论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坚持高质量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大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内涵非常丰富，寓意非常深刻。深刻理解和把握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重要论述的基本内容，对党和国家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深刻阐明新质生产力的丰富内涵

什么是新质生产力、如何发展新质生产力？这是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在思考探索的一个重要问题。2023年9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省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时首次提出“新质生产力”的概念：“积极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培育未来

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1]。2024年1月31日，中央政治局就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进行第十一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全面阐释了新质生产力的基本内涵：“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它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2]。其核心要义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新质生产力是跃升的生产力

跃升的生产力是对传统生产力的质的飞跃，揭示了新质生产力从量变到质变的生产力形态。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新质生产力是“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它“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3]。习近平总书记这一论述立足唯物辩证法质量互变规律阐明了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有量变和质变两种发展状态，二者的互相转化是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社会生产力在发展过程中也遵循这一规律。随着社会历史发展，一种生产力积累到一定时期必然会从量变转为质变，跃升为新的生产力。新的生产力又会在新的基础上开始量变到质变的积累，这一过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新质生产力的“跃升”，正是基于这一理论基础。首先，在劳动者层面，新质生

产力需要的不再是以简单重复劳动的劳动者，而是需要创新性人才。其次，在劳动资料层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4]。第三，在劳动对象层面，随着前沿科技发展与应用，劳动对象范围必然随之扩大。新质生产力不再需要低成本资源和要素的投入，而新能源、新材料、信息资源等越来越成为我国生产力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

（二）新质生产力是创新生产力

习近平总书记重视科技发展尤其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并且从三个方面深刻阐释了新质生产力的创新内涵。一是在来源上，新质生产力是科技创新的必然产物。他指出，新质生产力由技术突破性变革催生。也就是说，科技创新可以带来生产工具的改进、生产过程的优化等，进而推动生产力和经济社会的发展。二是在过程上，新质生产力依靠科技创新驱动。科技创新是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分析经济发展趋势时指出，过去低成本资源、劳动力要素投入的老路走不通，“新路在哪里？就在科技创新上”^[5]，科技创新是转换生产力发展路径的核心与关键，也是驱动发展新引擎。三是在成果转化上，新质生产力强调科技创新成果必须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创新必须落实到发展新质生产力上，“要及时将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到具体产业和产业链上”^[6]。由此可见，科技创新从来源、过程到成果转化始终贯穿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过程。

（三）新质生产力是绿色生产力

绿色生产力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产力，揭示了新质生产力绿色赋能的生产力形

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7]。这一论述表明了新质生产力与绿色生产力的直接联系，明确了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内涵。习近平总书记坚持人与自然的统一性，肯定了生产力的绿色内涵，并从发展理念、发展路径、产业结构等方面进行了阐释。一是在发展理念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质生产力“符合新发展理念”“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因此，新质生产力本身就以绿色发展为遵循，包含着绿色发展的内在要求。二是在发展路径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8]。习近平总书记认识到，现在的环境承载能力，已经难以承载高消耗、粗放型的发展。因此，新质生产力必然包含在发展路径上实现绿色转型。三是在产业结构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新质生产力区别于我国过去“形成的产业结构具有高能耗、高碳排放特征”^[9]，而是旨在形成绿色的产业结构，重视将绿色科技创新和先进绿色技术应用到具体产业和产业链，形成新的绿色经济增长点。

二、深入剖析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大现实意义

（一）掌握全球科技竞争先机的根本要求和现实需要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态势席卷全球，新技术突破加速带动产业变革，对世界经济结构和竞争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济全球化表面上看是商品、资本、信息等在全球广泛流动，但本质上主导这种

流动的力量是人才、是科技创新能力。”^[10]同时，“历史经验表明，那些抓住科技革命机遇走向现代化的国家，都是科学基础雄厚的国家；那些抓住科技革命机遇成为世界强国的国家，都是在重要科技领域处于领先行列的国家。”^[11]基于上述现实背景，他多次强调，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必须着眼长远、把握机遇、乘势而上，并警醒到，“如果我们不识变、不应变、不求变，就可能陷入战略被动，错失发展机遇，甚至错过整整一个时代”^[12]。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谁掌握了当前一轮科技革命的先发优势，谁就赢得了国际竞争的制胜之道，而发展新质生产力正是为中国赢得新一轮全球科技竞争战略主动的现实需要和重要支撑。

同时，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必须坚持独立自主，依靠自身科技突破和创新实现发展。同时要加强对世界各国政党合作，“共同反对任何人搞技术封锁、科技鸿沟、发展脱钩”^[13]，为在世界大局和时代潮流中把握中国发展的前进方向、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繁荣提供中国智慧和方案。

（二）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本质要求和关键举措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有鉴于此，习近平总书记曾就“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具体内涵作出过详细描述，指出人民“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更丰富的精神文化

生活”^[14]。这既呈现了人民群众需求的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特点，又为新时代发展新质生产力，进而为人民群众需求层次的品质提升和内容拓展的历史性变化提供坚实保障明确了努力方向。从供给侧看，“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是在对整个社会生产发展状况进行全面考察基础上提出的新论断，一方面，强调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余年来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摆脱落后局面，实现飞速跃升的现实成绩；另一方面，又明确表征当前“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15]的真实状况，强调了新时代社会生产的主要着力点，进一步明确应该将发展的重点由只注重物质生产拓展到“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16]上来，为新质生产力的出场和发展提供现实依据。说到底，国家发展、社会进步和人民幸福必须依靠发掘以创新为核心的新质生产力的现实价值才能得以完善和提升。

三、明确提出新质生产力理论框架

201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我们要紧紧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重大机遇，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2023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提出一系列加快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初步形成了新质生产力理论框架。

这一理论框架分别由新质生产力的涵义、基本内涵、生成条件、表现特征、本质属性五个方面的内容构成。一是新质生产力的涵义。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的，

摆脱了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先进生产力质态。二是新质生产力的基本内涵，即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三是新质生产力的生成条件，它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四是新质生产力的表现特征，有三个方面的体现：第一，创新特别是科技创新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除了科技创新，还包括制度、产业、业态模式、管理等方面的创新；第二，转变依靠要素投入的传统增长模式和发展路径，走创新驱动发展的新路，培育新动能；第三，体现“三高”特征，即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五是新质生产力的本质属性或衡量标准。新质生产力以新发展理念作为衡量标准，是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

四、正确揭示新质生产力与高质量发展之间内在逻辑联系

习近平总书记对发展新质生产力与推动高质量发展关系的深入思考，深刻揭示了新质生产力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

第一，高质量发展需要新质生产力理论指导，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我国高质量发展在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还存在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新质生产力理论的提出恰逢其时，它为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指南。新质生产力通过科技创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使生产要素提质增效、走绿色发展的路子，一方面能够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

率和产品质量；另一方面能够有效促进产业升级提质，持续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新动能，不断优化经济结构，从而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第二，使科技创新、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之间关系更加具体和清晰，并能与中国式现代化紧密联系，既有学理依据，又能具体指导和推动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伟大实践。

第三，从科技创新、绿色发展两重维度来看，发展新质生产力和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内在一致性。从新质生产力的基本内涵来看，创新尤其是科技创新在新质生产力中起主导作用，创新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特征。作为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科技创新能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我们要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从根本上说，还是要依靠科技创新”^[17]。

五、系统论述新质生产力的实践路径

（一）培育发展增长点：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他强调必须加强科技创新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新动能。与此同时，他也强调创新要实。科技创新成果，要依靠产业体系“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18]。产业是生产力变革的具体表现形式，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科技创新能够通过推动产业升级、优化产业结构等，引领产业创新，进而培养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

业创新，积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19]，同时他还进一步围绕“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做出四个方面的部署要求：一是要立足实体经济的根基；二是要“重视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20]；三是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构建上下游紧密合作的创新联合体”^[21]；四是要深入实施制造业的改造升级和设备更新，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

（二）增强发展动力：坚持全面深化改革

唯物史观认为，从性质上，生产关系具有相对稳定性，它在建立起来后一个阶段内不会发生显著变化。也就是说，“相比于生产力发展而言，生产关系的变革往往是滞后的”这就要求党带领人民群众自觉地推动生产关系的变革，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作了具体部署。一是在经济体制上，他强调，要完善落实“两个毫不动摇”的体制机制，加快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创新生产要素配置方式，释放更大的发展动能。二是在科技体制上，要协同推进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多元化加大科技投入，形成支持全面创新的基础制度，健全科技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三是在教育体制上，要根据科技发展新趋势，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优化基础学科教育体系，“进一步加强科学教育、工程教育”^[22]。四是在人才体制上，要根据科技发展新趋势，优化人才培养模式，完善人才培养、引进、使用、合理流动的工作机制，激发各类人才创新活力和潜力。

（三）增强发展动能：推进高水平科技

自立自强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动能”^[23]。从唯物辩证法关于内因决定论的基本原理看，新质生产力必须把发展放到自己力量的基本点上，建立在更加安全和可靠的基础之上。而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关键，就是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依靠独立自主发展科技事业。习近平总书记认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支撑，并对如何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出了重要要求。一是在核心技术上，要加强基础研究，努力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尤其是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攻关。二是在战略力量上，要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按照“四个面向”的要求，适应我国科技发展的需要，提升国家创新体系的整体效能。三是在发展道路上，要增强创新自信，坚持以提升创新能力为主线，重视人才自主培养，采取“非对称”赶超战略，坚持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奋斗目标，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

参考文献：

[1]习近平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强调 牢牢把握东北的重要使命 奋力谱写东北全面振兴新篇章[N].人民日报, 2023.9.10.

[2][3][6][7][8][18][23]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N].人民日报, 2024.2.2.

[4]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N].人民

日报, 2023.12.13.

[5]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 2018: 120.

[9]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23: 609.

[10][11][12]习近平.论科技自立自强[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3: 156,151,150.

[13]加强政党合作 共谋人民幸福[N].人民日报, 2021.7.7.

[1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7:20.

[15][18]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23:67,472.

[16]习近平.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J].求是, 2023.14.

[17]习近平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 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N].人民日报, 2023.3.6.

[19][20][21]习近平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强调 在更高起点上扎实推动中部地区崛起[N].人民日报, 2024.3.21.

[22]习近平在江西考察时强调 解放思想 开拓进取 扬长补短 固本兴新 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N].人民日报, 2023.10.14.

作者系深圳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
博士

责任编辑：陈宝华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与传统生态观的关系及价值研究

◆ 高 田

摘 要：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趋势，是一种融合生态规律和人类发展规律的新的文明形态。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继承了中华传统生态观中的优秀成分，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从源流上来讲是一脉相承的继承关系；汲取了近代生态实践的经验教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从时空上来讲是与时俱进的发展关系。立足新时代，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价值体现在对传统生态观的变革创新，表现为理论、战略、实践、发展等方面价值。

关 键 词：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传统生态观 关系与价值

基金项目：2024年度惠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地项目—“双碳”目标下领导干部的核心能力建设研究（HZSK2024JD062）；广东省人力资源研究会2024年度一般项目—领导干部推进“双碳”工作的核心能力及培训实施研究—GDHRS-24-02-018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成果，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为推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理论价值、战略价值、实践价值。

一、源流视角：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与

中华传统优秀生态观是一脉相承的发展关系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生生不息，孕育了深厚的生态文化。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生态观，指出“中华民族向来尊重自然、热爱自然，绵延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孕育着丰富的生态文化。”从中华传统生态观的形成过程来说，经历了理念萌芽、法制实践、思想凝练的历程，是一座理论与实践交相辉映的生态宝库，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根源。

（一）中华传统生态观的发展历程

数千年历史长河中中华文化蕴含着丰厚的生态理念，其发展经历了理念萌芽、法制实践、思想凝练的历程，涵盖哲学思想、实践行动、法制保障、长期践行等方面。古代中国早期，生产力相对低下，尚未形成系统的生态思想，对生态的认识散见于文献资料中，《史记·殷本纪》中记载，商汤王狩猎时，将围猎的网去掉三面，得到了“汤德至矣，及禽兽”的赞誉，这一行为非常恰当的体现了“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朴素生态观。在理念引导下，生态保护实践直接体现为刚性的立法规定，形成了直接有效的法律约束并在实践中得以体现，《管子·地数》记载，山林收获之时，如果未经允许擅自犯令，则“左足入、左足断；右足入，右足断。”还设置了专门的官员，“泽立三虞，山立三衡，”专门管理山林湖泽。宋元及之后的法令更加注重与人相关的生态关系的调节，如《大明律》规定“凡侵占街巷道路而起盖为园圃者，杖六十，各令（拆毁）复旧。其（所居自己房屋）穿墙而出秽污之物于街巷者，笞四十。出水者，勿论。”生态法令发展过程中，生态思想的凝练同步进行，形成了不同流派的生态思想，如儒家认为天地万物同根同源，共生共荣，主张以平等的态度对待自然，反对浪费自然资源，破坏生态平衡。最终凝练成了以“天人合一”的系统认识、“天行有常”的规律认识、“用之有度”的节约认识为代表的中华传统生态观。

（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对中华传统生态观的继承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华传统生态观对于当前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价值和作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从发展历程来看，就是对中华传统生态观的继承。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和发展的，在工作中充分重视生态环境建设工作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他“对生态环境工作历来看得很重。在正定、厦门、宁德、福建、浙江、上海等地工作期间，都把这项工作作为一项重大工作来抓”^[1]。早在青年时期，习近平通过克服重重困难在四川刻苦学习沼气池相关知识，最终带领广大村民在梁家河建造了第一个沼气池，极大改变了当地人的生活方式，造福了当地生态环境和百姓民生。在正定任职时，在经济发展重于一切的社会大环境下，制定“宁肯不要钱，也不要污染”的发展规划。^[2]在福建时，延续在厦门、宁德、福州等地改善生态环境，做到生态惠民的思路，创造性的提出了“福建要打生态牌”，建设生态省的战略构想。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环节，实现了从“唯GDP”到“绿色经济”的根本扭转。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实践逻辑下，生态思想的理论逻辑同步推进，形成了“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的人与自然共生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两山论，“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的生态民生论，“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的系统论，“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的法治体系建设论，“共同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共同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的全球生态

文明建设论，内涵丰富的科学体系中将中华传统生态观中“天人合一”的哲理思想贯穿始终，并拓展为全世界携手、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共识与共同行动，实现了对中华传统生态观的继承。

二、时空视角：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是与时俱进的发展关系

近代以来，“西升东降”的时代格局逐渐明显，中华传统生态观在国内生产力发展相对停滞的时代背景下同步受制，西方建构起了资产阶级统治世界的“文明”逻辑，人类生产力急速发展对生态的破坏更直接彻底，时代思想家马克思突破了近代西方哲学的束缚，引领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理论成果，又在时代发展中做到了与时俱进。

（一）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理论发展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由世界马克思主义者发展的生态思想的总和，其理论呈现在不同时代背景下与时俱进的特征。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观诞生于十九世纪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生产力快速发展的时代，对人与自然的认识、生态危机的根源和解决途径作了系统分析。从人类是自然物的判断出发，马克思关注到了工厂工人基本生存权益被漠视，而取得的巨大发展成果也有可能转瞬间成倍失去，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的方式只有通过革命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即“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

二十世纪，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当中，生态主权随着国家主权同步沦丧，如日俄势力侵占下东北森林遭受了毁灭式的开发，社会自然灾害频繁^[4]。中国共产党承担起了挽救民族危亡的重任，也承担起了恢复生态主权的重任，在建设社会主义中国的过程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中国化成果。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在国家整体建设规划中就含有生态建设，在绿化祖国的指引下注重生态建设的实效性，从而“绿化我们的国家，美化我国人民劳动、工作、学习和生活的环境”^[5]。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开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注重在工农业协调发展中保护生态，“考虑处理废水、废气、废渣这三废”^[6]。以系统治理的观点规划植树造林建设，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颁布，开启了我国依法造林护林的时代，形成了科学规划、法制体系建设、优化管理的生态观。江泽民的生态观以可持续发展观为指导，开始转变生产方式，“不能继续走盲目追求产值和扩大投资规模的粗放经营的老路。”强调“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良性循环”^[7]，胡锦涛的生态观在世纪之交转向生态文明建设，同时更加强调人民群众的生态权益和自然资源保护，主张生态文明建设“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8]。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继承马克思主义对生态自然的关注，继承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关切生态、重视生态的思想，把生态文明建设上升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走向新时代。

(二)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对于当前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价值和作用,从近现代以来的时空视域来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是与时俱进的发展关系,这种发展表现为精准定位、人民情怀、多维部署等三方面。

第一,从精准定位上来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进入崭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立足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总结中华传统生态观和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发展,以超前的战略眼光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历史征程,并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强调“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9]。精准定位了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

第二,从人民情怀上来说,党的十九大以来,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反映出人民对良好生态环境的追求和实现经济发展的多维需求,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保持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致力于实现人民幸福的初心,认为“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10],其生态思想中人民情怀展现为要把“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重点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加快改善生态环境质量”^[11]。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一以贯之的人民情怀。

第三,从多维部署上来说,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内容多元且具有明确的行动导向。其一,在社会生产力发展上,要推进绿色发展,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

系;其二,在生态危机应对上,要综合施策,解决突出环境问题;其三,在生态系统保护上,要加大保护力度,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其四,在体制机制上,要改革生态环境监管体制;其五,在环境治理上,要着力提高环境治理水平。体系先行、绿色发展、制度改革、化解风险、优化治理的多维举措充分反映了在人民情怀基础上落实行动的主动性和坚决性,创造性的回答了怎样建设生态文明的实践问题。

三、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时代价值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历史高度,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理论创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既与中华传统生态观一脉相承,创新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观,又在时代变革中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经验,创造性的回答了为什么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怎样建设生态文明的“生态之问”“时代之问”,体现了深邃的思想境界,具有跨越性的时代价值,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引。2022年10月16日,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12]。明确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这一生态文明建设奋斗目标,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对传统生态观的根本变革创新,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战略价值、实践价值、发展价值。

(一) 理论价值: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理论创新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与中华传统生态观一脉相承，创新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思想，又在时代变革中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经验，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历史演进的新起点，成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指引。

第一，中华传统生态观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瑰宝，蕴含着丰富且深刻的生态智慧。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运用传统生态智慧，“天不语而四时生，地不语而百物生”寓意着尊重自然运行规律的清醒认知，“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传达了万物并育、天人合一的美好希望，“草木植成，国之富也”代表了护育山林、富国利民的理想追求。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引取中华传统生态观的源头活水，让中华文明源流相继，一脉相承。

第二，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思想探寻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对资本主义世界生态危机的本质进行了全面阐释。马、恩认为人是脱胎于自然界、又依赖自然的自然存在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支配下，自然破坏，工厂生存环境恶劣，人的权益被漠视忽略，生态危机愈演愈烈，只有革命才能解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传经贯纬擘画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蓝图，让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思想跨越时代、创新发展。

第三，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形成了与时俱进的生态思想。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把认识和解决人与自然关系问题联系起来，提出“绿化祖国”的伟

大号召，为百废待兴的中华大地覆上新绿；改革开放后，在“植树造林，绿化祖国”的推动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等法律颁布执行，可持续发展战略实施，生态文明建设被纳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总目标中，走向法制化、可持续化、科学化的和谐发展。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继承中国共产党人关切生态、重视生态的思想，把生态文明建设上升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走向新时代。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进行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历史性成就，“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显著，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要步伐，我国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同时也明确指出生态文明建设正处于“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的攻坚期，”“有条件有能力解决生态环境突出问题的窗口期”^[13]。从理论价值来看，三期叠加下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传承中华传统优秀生态观，又在新时代推动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与时俱进，为指导新时代我们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怎样建设生态文明、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理论指引，形成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中国智慧，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超越了中华传统生态观的朴素认识，实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百年来从工业文明的环境保护理念到社会主义社会的生态文明理念的根本变革。

（二）战略价值：新发展理念指引下的战略创新

新中国成立以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确立了社会主义建设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农轻重相互协调发展的理念，生态建设摆在次要位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提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的重大判断，把“三个有利于”作为社会建设的标准，世纪之交，江泽民同志将可持续发展战略作为经济发展的指导之一，以胡锦涛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并将“建设生态文明”写入党的十七大报告，发展战略逐渐转变。

新时代，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以创新驱动实现协调循环发展、绿色发展和低碳发展，导向与世界共同进步的开放共享发展。立足新发展阶段，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深谋远虑，在2020年9月22日向世界郑重宣布，“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提出碳达峰碳中和发展战略，指出“我国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是党中央经过深思熟虑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14]。随后，针对实现双碳目标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部署，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等一系列政策文件，形成了1+N政策体系，为扎扎实实地实现双碳战略目标提供了路线图、时间表、好办法。党的二十大立足过去五年和新时代十年的伟大

变革，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在新征程上的使命任务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着重强调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是不同于西方现代化老路、具有中国国情特点、展现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发展之路，其中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马克思在探讨人与自然关系中所强调的人是自然的存在物，要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必须要实现共产主义，实现“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15]。中国式的现代化，正是在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理念指引下推动绿色发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百年变局和新冠疫情交织的时代背景之下，从新发展理念到碳达峰碳中和，从生态文明建设到中国式现代化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站在十四五时期“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高度^[16]，站在党的二十大提出的“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全方位统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性重任，推动实现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体现了战略价值导向下生态文明建设的系统性、综合性、全面性、前瞻性，使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展现出了重要的战略价值。

（三）实践价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创新

思想是行动的指南，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在和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实际中、结合中华传统生态观和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优秀成分形成的科学思想理论体系，在实践

中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创新。

从历史的实践来看，二十世纪，资本逻辑在“两个绝不会”的科学揭示下展现出了自身生命力，但也导致了二十世纪以来世界环境问题频频发生，《寂静的春天》纪实性的表达道，人类世界再也没有鸟儿歌唱，水、土壤、海洋、河流都成为了受害者。六十年代后，资本主义国家兴起环境运动，1988年，世界气象组织和联合国环境署成立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1997年《京都议定书》签订，2009年《哥本哈根协议》签订，2015年世界共同发布《巴黎协定》，全世界共同认识到了环境问题的严峻性，但是环境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

中国共产党人历来重视生态，习近平总书记继承并发扬了这一优良传统，保持着一以贯之的生态情怀，重视生态实践，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思想内容既是世界观，能指导我们领会生态文明的重要价值和作用，又是方法论，能引导我们在具体的实践中更好的建设生态文明。第一，坚持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领导。生态文明建设不是“毕其功于一役”，也不是“朝发夕至”，而是一个长期的建设和发展过程，从根本上来看，习近平总书记认识到解决生态问题的关键在党，着重加强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领导，深刻指出，“各地区各部门要增强“四个意识”，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决担负起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责任，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明确的责任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实际效果。第二，从党的十八大后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的成效来看，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向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亮剑，采取了一系列切实有效的措施，深入打好三大污染防治攻坚战，在建设美丽中国的过程中，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我们的祖国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第三，根据碳达峰碳中和的战略目标，我国将“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新进步”作为十四五规划发展目标，且制定了2035远景目标，“广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碳排放达峰后稳中有降，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基本实现”^[17]。站在推进战略行动的角度来说，把握实现双碳目标的现实任务，要在经济建设中，坚持绿色发展理念，改变发展模式，注重经济结构和重点领域重点行业能源结构的绿色转型，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推动绿色低碳技术前沿突破，完善政策体系和市场体系。党的二十大进一步明确提出“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具体要求，绿色低碳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全面转型的复杂工程和长期任务，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是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的任务，要坚定不移，稳中求进。

（四）发展价值：推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态发展创新

工业文明的迅速发展让全世界共同面临“人与自然如何相处”的难题，二十世纪以来，世界各国逐渐认识到环境问题的严峻性，主张共同应对，先后形成《哥本哈根协议》《巴黎协定》等国际共识，我国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全面履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承担大国责任，逐渐成为全球应

对环境问题的参与者、行动者、倡导者。

基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决策，为实现既定目标，解答人与自然之问，需要全人类的共同努力，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让世界上的更多国家得到更好发展，为更多人类个体过上美好生活而更加团结，习近平总书记倡导世界共同携手，应对气候变化，指出“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积极践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理念，愿继续同各方携手努力，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共同为子孙后代建设一个清洁美丽家园”^[18]。为实现既定目标，在世界人民共同建设生态文明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行动中，注重用发展的方式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成为世界各国的共同目标。其一，在理念上，化解零和博弈的非此即彼思维，传播合作、和平、共赢、共同发展的包容思维，传递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和谐理念，传达共商、共建、共享的中国声音。其二，在组织上，不断加深对外开放水平，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破解西方霸权主义所主导的你死我活的野蛮组织状态，在尊重、平等、互利的探讨协商中达成世界人民的共同心愿，维护全人类共同享有生态文明的基本权益。其三，在制度建设上，摈弃以地缘、亲缘、利益、博弈关系为主导的资本主义制度，倡导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核心建设各国共同面对危机、共同迎接挑战的互联互通、团结互助的制度模式。其四，在经济建设中，坚持绿色发展理念，改变发展模式，使经济发展从以往的资源消耗巨大转变为高效利用模式，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降低单位GDP增长能耗，实现绿色发展。其五，在社

会文明建设中，通过公益广告、影视作品、纪录片等媒介进行线上线下的宣传，普及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及积极意义，培育全社会良好的生态认知和健康的生活习惯，形成社会主义社会生态文化新风尚。综合而言，一系列有力度、有实效的实际行动织密了法制体系，形成了制度制定、制度执行、制度激励的刚性约束，并将约束传导至社会生活，推动全民守法、爱护环境形成风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度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增强我国在全球环境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积极引导国际秩序变革方向，形成世界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解决方案。在时代变局中引导全球变革方向，共谋全球生态文明，为推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生态发展创新答案。

“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趋势”^[19]，是一种超越工业文明的新型文明形态。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战略任务，在生态文明建设的道路上必然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在实践中促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依靠人民而建、建设成果为人民共享，让生态文明成为世界共同的宝贵财富。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征程中，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要“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20]。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中进一步强调，“必须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21]，在发展中，我们务必要深刻认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与传统生态观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演进

关系，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创新内容，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更加优异的成绩，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1]习近平.论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269.

[2]将改革进行到底[M].北京：人民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17：117.

[3]共产党宣言[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51.

[4]王希亮.近代中国东北森林的殖民开发与生态空间变迁[J].历史研究，2017.1.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国家林业局编.毛泽东论林业（新编本）[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77.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文集（一九四九—一九七四）（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381.

[7]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EB/OL].http://www.scopsr.gov.cn/zlzx/ddh/ddh17_3963/ddh173/201811/t20181121_329071.html, 1993.11.14.

[8]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9.

[9]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10.

[10]平语近人：习近平总书记用典[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12.

[11]习近平.论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

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M].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256.

[12]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N].人民日报，2022.10.17.

[13]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2-3.

[14]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强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N].人民日报，2021.3.16.

[1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85.

[16]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46.

[17]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EB/OL].http://www.xinhuanet.com/2021-03/13/c_1127205564_17.htm.2021.01.12.

[18]习近平向国际竹藤组织成立二十五周年志庆暨第二届世界竹藤大会致贺信[N].人民日报，2022.11.08.

[19]习近平.共同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N].人民日报，2021.10.13.

[20]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N].人民日报，2022.10.17.

[21]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N].人民日报，2024.7.19.

作者系广东东江干部学院教学研究部讲师
责任编辑：单娟娟

西吉县悬赏捕猎野猪的做法与启示

◆ 龙生平

摘 要：随着退耕还林还草及生态修复工程的深入推进，西吉县林草面积逐步扩大，野猪数量随之激增，对当地生态和经济造成严重影响。为此，西吉县采取悬赏捕猎行动，旨在科学调控野猪种群数量，维护生态平衡。通过精心策划与组织，该行动有效控制了野猪数量，减轻了其对农作物的破坏，并引发了广泛关注。本文探讨了西吉县悬赏捕猎野猪的做法及其背后的多重意义。分析了悬赏捕猎在生态修复、民生保障、法治建设等方面的作用，并提出了未来展望，强调科学调控、生态意识、科技支撑、法规完善及区域协同的重要性。

关键词：悬赏捕猎 野猪调控 生态修复 民生保障 法治建设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双碳目标下西北地区新能源协同优化的结构测度、实现机制与支持政策”（编号：22BGL220）

近年来，西吉县在退耕还林还草、城乡绿化等生态修复工程上取得了显著成效，生态环境得到显著改善。然而，随着生态的好转，野猪、野鸡等野生动物数量激增，在个别乡镇、山林、村洼地区，野生动物数量已超出生态红线，对人身安全、家畜、交通、粮食、果树、蔬菜等造成了严重危害。这种“双刃剑”效应，既展现了生态修复的成效，也凸显了野生动物管理的新挑战。在科学调控野生动物种群数量的背景下，西吉县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导向，策划并实施了悬赏捕猎野猪的行动。这一行动旨在通过科学、

有序的方式，控制野猪数量，减少其对当地生态和经济的负面影响。在野生动物泛滥的地方，是否要大规模捕杀？是否要放开食用野生动物禁令？是否能用枪猎杀野猪？这些问题随西吉县悬赏捕猎的深入推进，逐步成为网友们热议的重点，也为未来的政策制定和实施提供了案例参考。

一、悬赏捕猎野猪与野生动物种群数量调控的关系

（一）生态修复与种群平衡的精准调控

一是悬赏捕猎，生态修复的必要手段。随着生态环境的逐步改善，野生动物种

群数量显著增加，但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如野猪等动物的泛滥对农作物、家畜乃至人类生活造成了严重威胁。在此背景下，悬赏捕猎作为一种有效的生态修复手段应运而生。胡璐（2024）提出，通过悬赏捕猎，能科学调控野生动物种群数量，避免其过度增长对生态系统造成破坏^[1]。这种手段不仅有助于维护生态平衡，还能促进生态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二是种群平衡，生态安全的重要保障。种群平衡是生态系统稳定和健康的基础。杜世平等人（2024）通过研究浙江丘陵林业生产区野猪的分布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发现科学调控野猪种群数量对于维护生态平衡具有重要意义^[2]。悬赏捕猎作为一种有效的种群调控手段，可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调整捕猎数量和强度，确保野生动物种群数量保持在合理范围内，从而保障生态安全。

三是精准施策，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高质量发展要求我们在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找到平衡点。悬赏捕猎作为一种精准施策的手段，能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同时促进经济发展。严星雨等人（2024）认为，通过科学调控野生动物种群数量，能减少其对农作物和家畜的破坏，降低农民的经济损失；同时，悬赏捕猎还能为当地创造一定的经济收益，促进地方经济发展^[3]。随着生态修复和种群调控工作的不断深入，悬赏捕猎将成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

（二）民生保障与生态保护的和谐共生

首先，民生保障，减少野猪致害的现实需求。随着野猪数量的激增，其对农作物的破坏日益严重，给农民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通过悬赏捕猎，能有效控制野猪数量，

减少其对农作物的破坏程度，从而保障农民的切身利益。这种手段不仅有助于缓解人兽冲突，还能提升农民的生态保护意识。

其次，生态保护，维护生物多样性的长远考量。生态保护是维护生物多样性的长远考量。悬赏捕猎作为一种科学的种群调控手段，能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同时维护生物多样性。尹铎和杨博（2024）认为，通过合理控制野生动物种群数量，可避免其过度增长对生态系统造成破坏；同时，悬赏捕猎还能激发公众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形成全社会共同保护生态环境的良好氛围^[4]。

再次，和谐共生，民生保障与生态保护的统一。民生保障与生态保护并非矛盾对立的关系，而是可以和谐共生的。刘翱（2024）指出，通过科学调控野生动物种群数量，能在保障民生的同时促进生态保护^[5]。悬赏捕猎作为一种有效的手段，可在减少野猪致害的同时维护生态平衡和生物多样性，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愿景。

（三）法治建设与生态治理的深度融合

其一，法治建设，规范悬赏捕猎行为的基石。法治建设是规范悬赏捕猎行为的基石。鲁晓明（2021）指出，“禁止食用野生动物”的法律规制为悬赏捕猎提供了法律依据^[6]。通过加强法治建设，明确悬赏捕猎的合法性和规范性要求，并加强对相关行为的监管和执法力度。这将有助于确保悬赏捕猎活动的有序进行并取得实效。

其二，生态治理，提升悬赏捕猎效果的关键。生态治理是提升悬赏捕猎效果的关键。陈立毅和季晨佳（2023）认为，通过加强生态监测和评估工作力度，可及时了解野生动物种群数量的变化情况以及其对生态环

境的影响程度^[7]。这为悬赏捕猎提供科学依据和决策支持，有助于提升捕猎活动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其三，深度融合，法治建设与生态治理的相互促进。法治建设与生态治理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关系。董前程和王慧芬（2023）指出，通过加强法治建设有利于规范悬赏捕猎行为、保障生态安全；同时，通过加强生态治理有利于提升悬赏捕猎效果、促进生态平衡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8]。二者之间的深度融合将有助于推动生态保护工作的深入开展和取得实效。

（四）创新驱动与生态经济的协同发展

第一，创新驱动，提升悬赏捕猎效率的动力。创新驱动是提升悬赏捕猎效率的重要动力来源。谭莉萍等人（2023）指出，通过引入新技术、新设备和新方法等手段能提高悬赏捕猎的精准度和效率水平^[9]。例如利用无人机、红外相机等现代科技手段进行野生动物监测和追踪以及采用先进的猎捕工具和方法，能提高捕猎成功率。这些创新举措将有助于提升悬赏捕猎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第二，生态经济，拓展悬赏捕猎价值的途径。生态经济是拓展悬赏捕猎价值的重要途径。陈俊峰和谢屹（2023）认为，通过合理利用悬赏捕猎所获得的野生动物资源，可开发相关的生态产品和服务，并形成产业链条和经济效益^[10]。例如利用野猪肉等资源开发食品加工业以及开展生态旅游等活动。这将有助于拓展悬赏捕猎的价值空间并促进当地经济发展。

第三，协同发展，创新驱动与生态经济的相互促进。创新驱动与生态经济是相互促进、协同发展的关系。顾佳音等人（2024）

指出，通过加强创新驱动能提升悬赏捕猎的效率和水平；同时，通过发展生态经济可拓展悬赏捕猎的价值空间并为当地经济发展提供有力支持^[11]。二者之间的协同发展将有助于推动生态保护工作的深入开展和取得实效，并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目标的实现。

二、西吉县悬赏捕猎野猪的基本情况

生态变化与野猪泛滥的严峻现实。一是退耕还林成果显著，生态环境显著改善。在“西部大开发”战略驱动下，西吉县通过多年的退耕还林还草工程，生态环境得到了显著改善。森林覆盖率大幅提升，植被恢复良好，为野生动物提供了良好的栖息环境。然而，这也为野猪等野生动物的繁殖提供了有利条件。二是野猪数量激增，超出生态承载力。据最新数据显示，西吉县野猪数量已激增至2600多头，远超区域生态环境承载力。野猪的泛滥不仅破坏了农作物，还威胁到了当地居民的生活安全。三是人猪矛盾尖锐，社会反响强烈。野猪的泛滥引发了严重的人猪矛盾。农作物受损、家畜被袭、人身安全受到威胁等问题频发，当地农民和基层干部对此反响强烈，迫切希望采取有效措施解决这一问题。

悬赏捕猎野猪的策划与组织。一是国家政策导向明确，地方积极响应。在国家林草局等部门的政策指导下，西吉县积极响应号召，策划了悬赏捕猎野猪的行动。这一行动旨在通过科学调控野猪种群数量，维护生态平衡和当地居民的切身利益。二是精心策划组织，确保行动有序进行。西吉县林草局等相关部门精心策划了悬赏捕猎野猪的行动方案。从猎人的招募、选用到装备配备、监管帮助等方面都做了周密的安排和部署。同

时，还制定了详细的应急预案和安全措施，确保行动有序进行。三是广泛宣传动员，提高社会认知度。为了提高社会对悬赏捕猎野猪行动的认知度和支持度，西吉县通过多种渠道进行了广泛宣传动员。包括电视、广播、报纸等传统媒体以及微信、微博等新媒体平台都积极参与其中，为行动的顺利开展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

猎人的招募与选用。一是严格筛选猎人队伍，确保专业素质过硬。西吉县在招募猎人队伍时，严格遵循了专业、安全、高效的原则。通过层层筛选和考核，最终确定了6支专业野猪捕猎队伍和1支野猪无害化处理队伍。这些队伍成员均具有丰富的猎捕经验和专业素质，能够确保行动的顺利进行。二是配备先进装备，提升捕猎效率。为了提升捕猎效率，西吉县为猎人队伍配备了先进的装备。包括无人机、红外相机、猎犬等现代化工具都得到了广泛应用。这些装备的配备不仅提高了捕猎的精准度和效率，还降低了猎人的安全风险。三是加强监管与帮助，确保行动合法合规。在悬赏捕猎野猪的行动过程中，西吉县林草局等相关部门加强了对猎人队伍的监管与帮助。通过定期检查、随机抽查等方式，确保猎人队伍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操作规程。同时，还为猎人队伍提供了必要的帮助和支持，如技术培训、安全保障等，确保行动的合法合规和顺利进行。

社会反响与态度。一是当地农民积极支持，期待解决野猪问题。西吉县悬赏捕猎野猪的行动得到了当地农民的积极支持。他们普遍认为这一行动能够有效解决野猪泛滥问题，保护农作物和家畜的安全。许多农民还主动参与到行动中来，为猎人队伍提供线索

和帮助。二是基层干部高度重视，全力配合行动开展。西吉县的基层干部也高度重视悬赏捕猎野猪的行动。他们全力配合相关部门开展工作，为猎人队伍提供必要的支持和保障。同时，还积极宣传动员群众参与到行动中来，共同维护当地的生态平衡和经济发展。三是网络舆论关注度高，热议不断。西吉县悬赏捕猎野猪的行动也引起了网络舆论的广泛关注。许多网友纷纷发表评论和看法，对行动表示支持和关注。一些网友还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为行动的进一步完善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三、西吉县悬赏捕猎野猪的做法与成效

科学组织与管理，确保行动高效有序。首先，精心策划行动方案，明确目标任务。西吉县在悬赏捕猎野猪行动前，精心策划了行动方案。明确了目标任务、时间节点和责任人等关键要素，为行动的顺利开展提供了有力保障。同时，还根据实际情况不断调整和完善方案，确保行动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其次，严格选用猎人队伍，提升专业素质。在猎人队伍的选用上，西吉县坚持高标准、严要求。这些队伍成员均具有丰富的猎捕经验和专业素质，能够确保行动的顺利进行。同时，还定期对猎人队伍进行培训和考核，不断提升其专业素质和能力水平。再次，加强监管与协调，确保行动合法合规。在悬赏捕猎野猪的行动过程中，西吉县林草局等相关部门加强了对猎人队伍的监管与协调。通过定期检查、随机抽查等方式，确保猎人队伍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操作规程。同时，还积极协调各方力量和资源，为行动的顺利开展提供有力支持。

猎人专业优势凸显，提升捕猎效率与安

全性。首先，猎人经验丰富，熟悉地形与野猪习性。西吉县选用的猎人队伍均具备丰富的猎捕经验。他们熟悉当地的地形和野猪习性，能够准确判断野猪的活动规律和栖息地。这一优势在猎捕过程中得到了充分发挥，大大提升了猎捕的精准度和效率。其次，装备先进齐全，提升猎捕科技含量。为了提升猎捕效率，西吉县为猎人队伍配备了先进的装备。包括无人机、红外相机、猎犬等现代化工具都得到了广泛应用。这些装备的配备不仅提高了猎捕的精准度和效率，还降低了猎人的安全风险。同时，还通过科技手段对猎捕过程进行实时监控和数据分析，为行动的进一步优化提供了有力支持。再次，团队协作紧密，确保行动顺利进行。在悬赏猎捕野猪的行动中，猎人队伍之间形成了紧密的协作关系。他们相互配合、共同作战，确保了行动的顺利进行。同时，还通过信息共享和沟通交流等方式，不断提升团队协作的默契度和效率。

选择合适地点与时机，确保猎捕成效最大化。首先，科学划定猎捕区域，避免生态破坏。在悬赏猎捕野猪的行动中，西吉县科学划定了猎捕区域。将猎捕活动限制在全县19个乡镇集体林区和9个国有林场林区范围内，并明确规定了火石寨自然保护区等敏感区域不得进行猎捕活动。这一措施有效避免了生态破坏和野生动物资源的过度消耗。其次，精准把握猎捕时机，提升猎捕成功率。西吉县在悬赏猎捕野猪的行动中，精准把握了猎捕时机。根据野猪的活动规律和习性，选择在野猪出没频繁的时间段和地点进行猎捕活动。这一措施大大提升了猎捕的成功率和效率。再次，灵活调整猎捕策略，应

对复杂情况。在悬赏猎捕野猪的行动过程中，西吉县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调整猎捕策略。针对不同地形、不同天气条件以及野猪的不同活动状态等因素，采取不同的猎捕方法和手段。这一措施有效应对了复杂情况的发生，确保了猎捕活动的顺利进行和成效最大化。

成效显著，有效控制野猪数量，维护生态平衡。首先，野猪数量得到有效控制，危害程度降低。通过悬赏猎捕野猪的行动，西吉县成功控制了野猪数量的过快增长。据统计，行动期间共猎捕成年野猪数十头，有效降低了野猪对农作物和家畜的危害程度。同时，还通过无害化处理等方式妥善处理了猎捕的野猪尸体，避免了环境污染和疾病传播等问题的发生。其次，生态环境得到保护，生物多样性得以维持。悬赏猎捕野猪的行动不仅有效控制了野猪数量，还保护了当地的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通过科学划定猎捕区域和精准把握猎捕时机等措施，避免了生态破坏和野生动物资源的过度消耗。同时，还促进了当地生态系统的平衡和稳定发展。再次，社会反响热烈，增强了公众生态保护意识。西吉县悬赏猎捕野猪的行动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热议。许多网友纷纷发表评论和看法，对行动表示支持和关注。同时，还通过媒体宣传等方式提高了公众对生态保护的认识和意识。这一行动不仅解决了实际问题，还促进了公众生态保护意识的提升和普及。

四、西吉县悬赏猎捕野猪的启示与建议

首先，科学调控种群数量，守护生态平衡之基。西吉县悬赏猎捕野猪的举措深刻揭示，科学调控野生动物种群数量，乃是维护

生态平衡与可持续发展的坚实基础。唯有通过精准把控野猪等野生动物的数量与分布，方能有效减轻其对农作物、家畜乃至人类安全的潜在威胁，同时确保生态环境与生物多样性资源免遭破坏与过度消耗。为此，应进一步强化野生动物种群数量的监测与评估体系，依托科学数据，制定并实施科学合理的调控策略。此外，还需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大执法力度，确保调控措施得以有效落实，为生态平衡保驾护航。

其次，强化生态意识担当，共筑和谐共生之桥。西吉县的实践亦启示我们，强化生态保护意识与责任担当，是通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境界的必由之路。唯有深刻认识生态保护的紧迫性与重要性，方能激发全民参与生态保护的热情；唯有切实履行生态保护之责，方能为后代子孙留下一片绿水青山。因此，应加大生态教育与宣传力度，提升公众的环保意识与责任感。同时，通过政策引导与激励措施，鼓励社会各界投身生态保护实践，共同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蓬勃发展。

再次，科技支撑创新驱动，赋能调控高效精准。西吉县的捕猎行动还昭示，科技支撑与创新驱动是提升野生动物种群数量调控效率与质量的关键所在。通过引入前沿科技手段与创新思维，可大幅提升调控工作的精准度与效率，同时有效降低成本与风险。为此，应加大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力度，不断提升科技支撑能力；同时，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借鉴先进经验，为调控工作注入新的活力与智慧。

最后，完善法规强化监管，筑牢依法调控之堤。完善法律法规体系与加强执法监管力度，是确保野生动物种群数量调控工作依

法依规有序开展的重要保障。唯有建立健全法律法规体系，方能有效遏制非法猎杀、贩卖野生动物等违法行为；唯有加强执法监管，方能提升违法成本，形成有力震慑。因此，应加快法律法规的修订与完善步伐，及时填补制度空白；同时，加大执法力度，提高监管效能，为野生动物种群数量调控工作营造风清气正的法治环境与社会氛围。

悬赏捕猎野猪是一项政策性强、创新性强的系统工程，这一做法对基层干部的要求高，对政策尺度的把控要求准，对当地山林、产业及人居情况的了解要求细，需要在更高层面上对相关做法给予关注，且加以适当的规范和引导。为此，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创新捕猎技术体系，全面提升调控效能。针对当前笼捕、网捕及猎狗围猎等传统方法存在的效率低下问题，亟需探索并实践更为高效、精准的捕猎方法与技术手段。建议积极引入无人机侦察定位技术，结合热成像监测追踪系统，实现野猪活动轨迹的实时捕捉与精准锁定，从而大幅提升捕猎的精准度与整体效率。同时，应加强对猎捕队伍的专业技术培训与实战演练，通过模拟实战场景、传授先进捕猎技巧，全面提升猎捕队伍的专业素质与实战能力。此举措旨在从根本上提升捕猎效率与成功率，有效降低工作成本，将潜在风险降至最低。

第二，构建野猪肉资源化机制，激发全民猎捕热情。面对野猪肉禁止食用导致群众猎捕积极性受挫的现状，需加快构建野猪肉资源化利用机制，以激发广大群众的猎捕积极性。建议成立野猪肉检测与加工处理中心，对捕猎所得的野猪肉进行严格的安全检测与标准化加工处理，确保产品符合食品安

全标准后，再行销售或捐赠。同时，政府应出台相关政策扶持与资金补贴措施，鼓励更多企业与个人投身于野猪肉的资源化利用事业，共同推动该机制的完善与发展。此举旨在通过市场化运作与政策支持相结合的方式，有效激发群众的猎捕热情，进而提升调控工作的整体效率与质量。

第三，特定条件下开放枪猎，助力调控效果提升。针对当前禁止枪猎野猪导致调控效率难以显著提升的问题，应在确保安全、合法的前提下，探索在特定条件下开放枪猎的可能性。建议对具备相应资质与条件的专业猎捕队伍，经严格审核后允许其使用枪支进行捕猎活动。同时，应加强对枪支的严格管理与安全监管，确保捕猎过程的安全性与合法性。此举措旨在通过提高捕猎效率与成功率，有效降低调控成本，同时为其他地区的野生动物种群数量调控工作提供有益的借鉴与参考。

第四，强化区域协同联动，打造调控工作新格局。针对当前各地在野生动物调控工作中存在的协同不足、信息共享不畅等问题，应积极推动区域协同与联动机制的建设与完善。建议与其他地区建立野生动物种群数量调控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定期交流工作经验与成果，共享信息资源与数据支持。同时，应加强跨区域联合执法与应急处置工作力度，形成调控合力，共同应对野生动物种群数量调控工作中面临的挑战与问题。此举旨在通过强化区域间的协同与合作，全面提升整体调控成效，推动野生动物种群数量调控工作迈向更高水平的发展阶段。

参考文献：

- [1]胡璐.野猪致害频发，咋回事？怎么办？[N].新华每日电讯，2024.11.1.
- [2]杜世平，吴怡豪，鲁庆斌，等.浙江丘陵林业生产区野猪的分布状况及其影响因素[J].兽类学报，2024.44.
- [3]严星雨，徐菲菲，钟雪晴.野生动物旅游研究：进展与展望[J].旅游科学，2024.38.
- [4]尹铎，杨博.国家公园中的野生动物旅游与多物种共生[J].旅游学刊，2024.39.
- [5]刘翔.和谐共生理念在动物保护立法中的实践——兼论中日动物保护的交流与互鉴[J].时代法学，2024.22.
- [6]鲁晓明.“禁止食用野生动物”的法律规制[J].上海政法学院学报(法治论丛)，2021.36.
- [7]陈立毅，季晨佳.生态文明法治理论视野下环境犯罪治理[J].人民检察，2023.S1.
- [8]董前程，王慧芬.生态伦理视域下的野生动物保护[J].林业调查规划，2023.48.
- [9]谭莉萍，刘俊辰，王剑武，等.浙江省野猪资源及与人类冲突现状[J].应用生态学报，2024.10
- [10]陈俊峰，谢屹.野生动物肇事、致害补偿与农户野生动物保护意愿[J].林业科学，2023.59.
- [11]顾佳音，王巍，郭晓艺，等.小兴安岭南麓野猪春冬季行为状态的生境选择[J].生态学报，2024.44.

作者系中共宁夏区委党校（宁夏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副教授，管理学博士，管理科学与工程博士后

责任编辑：单娟娟

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进一步 全面深化改革

◆ 徐兴红 刘 婷

摘 要：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贯彻“六个坚持”的重大原则，其中包括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决定》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主线的确认，既是对于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新征程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行动指南，对于我们深刻领会全会精神，践行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立足于新的历史起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深刻领会和把握这一重大原则，将制度建设作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主线突出出来，确保在制度建设上取得新的成效。

关键词：制度建设 全面深化改革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

一、制度建设对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意义

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要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而且制度建设的方向和实质是中国式制度现代化，这既符合中国改革本身的内在逻辑，也是改革开放进入新时代的客观要求。

（一）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的理论依据
以制度建设为主线决定了制度建设对于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而言具有丰富而深刻的内涵。制度，是指得到社会认可的约束和激励人们行为的一系列规则、规范、法律和法规的集成，它们通常由正式规则、非正式规

则和实施机制构成，具有权威性、规范性、稳定性和普遍性，对社会运行和发展具有引领和保障作用，既是现代国家运行和发展的规则和秩序基础，也是国家现代化建设和发展的重要载体。

制度建设的动力是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发展。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制度建设和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因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是作为社会基本矛盾具体体现的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指出，面对新征程上我国发展面临

的主要矛盾和衍生问题，“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从体制机制上推动解决。”^[1]

制度建设的条件是与国家根本价值和规则方式相一致。在现代化进程中，制度建设是指一个国家按照现代化发展的要求，基于国家根本价值，以规则化的方式，对于社会成员的行为及其相互关系加以规范，在制度优化和创新中逐步构成国家治理体系，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激发社会活力，推进生产力发展，实现国家政治稳定和长治久安的过程。世界现代化的历史表明，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制度竞争是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尤其是在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制度更发挥着根本性、决定性和长期性作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深刻指出“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2]。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制度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问题。”^[3]由此深刻揭示了制度对于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价值。

（二）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意义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相对于其他要素和路径，制度建设是确保改革的政治方向，激发社会发展活力，为现代化发展提供强大动力和规则保障的关键选择，是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全局性、长期性和持久性的根本举措。新时代以来，党和国家把制度建设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制度建设分量更重，由此形成了新时代改革开放的一个新特点。以制度建设为主线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突出显示了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牵引关键、突出重点和引领全局，抓住主要矛盾的

主要方面的战略思路，体现着对于全面深化改革规律的深刻把握。

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是我们党破除体制机制阻碍的必然要求。我们党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各方面制度，着力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用制度体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加强文化领域制度建设，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持社会安定有序；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等等。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加强制度建设，各领域基础性制度框架基本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了有力制度保障，也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奠定了坚实基础。

以制度建设为主线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我们党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重要认识和结论。重视和加强制度建设，是我们党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重要认识和结论。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制度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各方面的制度日益健全、不断完善，治国理政的制度化水平明显提高。新时代以来，我们党把制度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定为全面深

化改革的总目标。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专门研究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问题，系统总结我国制度建设的重要经验，把改革开放以来制度探索创新的成果纳入系统化、整体化、规范化的制度体系和治理体系。

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是我们党开创新局的迫切需要。改革始终要处理好坚持与发展、守正与创新、历史与未来的关系，既不能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能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要在守正与创新的统一中开创新局面。制度强则国家强、制度稳则国家稳，改革就是要逐步形成完善成熟的制度体系，制度改革和创新伴随改革整个过程。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前进道路上的各种矛盾和风险挑战日益复杂，要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就必须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用完善的制度防范化解风险、有效应对挑战。

二、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的遵循

促进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良性互动。一方面，加强顶层设计、总体谋划，将制度建设放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统筹谋划，准确把握人民群众的共同愿望，深入探索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对各领域体制机制作出系统设计。同时，着力增强不同环节、不同层级制度之间的紧密衔接、有机贯通。另一方面，尊重人民首创精神，鼓励地方、基层、群众积极探索，鼓励不同区域进行差别化试点，并及时总结实践中的好经验、好做法，推动成熟的经验和做法上升为制度、转化为法律。

坚持“立”与“破”辩证统一。当前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涉及范围广、触及利益深，重大改革举措可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

这就要求制度建设必须坚持破立并举、先立后破，既要防止只立不破，也要防止先破后立。一方面，坚持“立”字当头，秉持于法周延、于事简便的原则，“把中央要求、群众期盼、实际需要、新鲜经验结合起来”^[4]，不断健全已有制度，加快推进新领域、新实践的制度创新，填补制度空白。另一方面，坚持以“破”疏堵，及时修改或废止不适应改革发展要求的法律制度，坚决破除一切制约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的体制机制障碍，打通制约各项制度有效运行的“中梗阻”。

推动健全制度体系与强化制度执行有机结合。一方面，健全制度体系是基础。从过程维度来看，制度演进包括制度生成、巩固、完善、成熟4个阶段，各阶段面临的主要问题不同，相应的任务各有侧重，健全路径自然也各有差异。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的不同层级制度实际上处于制度演进的不同阶段，对此必须有针对性地采取不同健全路径，推动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另一方面，强化制度执行是关键。作为“关键少数”的领导干部必须切实强化制度意识，带头维护制度权威，带动全体人民形成主动遵从制度和按照制度办事的自觉。同时，推动形成刚性的权力约束机制、严格的制度执行督察机制，积极开展督察促落实工作，确保制度时时生威、处处有效。

三、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的实践要求

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必须在明确不同制度层级功能作用和彼此间关系的基础上，有的放矢地提出相应的实践要求。就是要“加强顶层设计、总体谋划，破立并举、先立后破，筑牢根本制度，完善基本制度，

创新重要制度”^[5]，不断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和国家治理效能。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是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四梁八柱，这些制度之间呈现出全面、广泛、有机衔接的结构关系。其中，根本制度是制度体系的核心，统领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基本制度是制度体系的“主干”，遵循根本制度，制约和影响重要制度；重要制度是制度体系的“枝叶”，遵循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并根据实践需要不断做出调整，为根本制度、基本制度的巩固和发展提供支撑。

筑牢根本制度。根本制度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能起到顶层决定性、全域覆盖性、全局指导性作用的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包括哪些制度、判断根本制度之根本性的标准是什么，理论界的认知不尽一致，而搞清楚这些问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目前，我们已经明确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党的领导制度这一根本领导制度、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等。这些根本制度的共性、本质就是基因性、奠基性的立国制度。中国共产党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创立的政党，从一开始就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并在党的七大党章中以“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6]的表述予以规范。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如果没有始终努力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就不会有中国共产党

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就。对党的领导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制度、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制度等根本制度，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巩固。

完善基本制度。基本制度是通过贯彻和体现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的基本原则，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等发挥重大影响的制度。党中央已经明确的基本制度包括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等。如果说根本制度是立国制度，基本制度就是治国制度，是党在新中国70多年的执政实践中艰难探索创新而奠定的治国理政的主要制度。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等基本制度，要与时俱进完善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已经明确很多年，而基本经济制度近年来出现重大发展。党的十五大明确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7]。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8]。“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正式被明确为党的十八大以来最重要的原创性理论之一，并载入党章。

创新重要制度。重要制度是由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派生而来的，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的具体的主体性制度，上接国家治理之顶层，下连社会生产生活方方面面之基层，

创新和发展空间最大。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加快建立健全国家治理急需、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必备的重要制度，创新和细化各项制度在各层级落地落实的具体机制、运行规范、操作程序。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各个方面的重要制度进行了梳理，并提出了坚持和巩固、完善和发展、遵守和执行的明确要求。13个方面50多条制度中除了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之外都是重要制度，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之下也包括重要制度。重要制度是各领域的基础性制度、管方向和定原则的制度。党的二十大强调：“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优化营商环境。”^[9]市场经济上述四大基础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体系中的重要制度，而我们在这四大基础制度上都有较大缺陷，导致“两个毫不动摇”没有完全落实到位，国企民企平等对待的要求没有在法律法规政策上完全落实到位，这是信心不足、预期不稳、活力不够的重要制度根源。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特别强调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这是我们看准了的事，也是理论和实践都反复证明了的事，必须以最快速度、最大力度、最高标准坚决改革创新。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需要在制度层面充分体现其适应性、灵活性、可行性。要在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

度共同确定的制度框架中，充分发挥这些制度内蕴的能量，使其转化为强大的治理效能，把弹性边界之外的制度问题更加敏捷、全面地向上传导，更好地筑牢根本制度、完善基本制度、创新重要制度。

参考文献

- [1]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的说明[N].人民日报,2024.7.22.
- [2]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33.
- [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185.
- [4]习近平.论党的自我革命[M].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114.
- [5]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M].北京:学习出版社,2024:6.
- [6]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2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533.
- [7]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17.
- [8]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280-281.
- [9]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24.

作者徐兴红系中共吴忠市委党校科研与决策咨询部主任

作者刘婷系中共吴忠市委党校讲师

责任编辑:孔晓

新时代共同富裕的内涵特征与实现路径

◆ 张 婷

摘 要：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在迈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上，必须把共同富裕摆在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实现共同富裕是一项艰难而且长期的任务，需要全体人民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充分调动积极性和主动性，推动实现共同富裕。

关键词：共同富裕 中国式现代化 高质量发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当作出发点和落脚点，致力于维护和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①、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一、从“两个大局”把握共同富裕的时代背景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步入新时代，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成为重要的时代特征。

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角度来看，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初，就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自己的使命和目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已经意识到要彻底改变中国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鼓励一些人和地区先富起来，以带动后富。2012年以来，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的，第一，国力更加强盛。到2021年底，我国GDP超过了114万亿美元，2010年以来一直稳居世界第二位；外汇储备位于世界第一位；修建了世界最大的高速公路网和铁路网；一批国家重点核心关键技术实现了重大突破，在载人飞船、大飞机制造、卫星导航、核能科技、量子通信、探月探火等领域取得了重大成果。第二，百姓更加富足。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路，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上持续用力，人民生活全面提高。第三，保障更加稳固。已经形成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和医疗卫生水平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另一方面，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全球格局正在加快调整，世界和平与发展正在遭遇巨大的挑战。随着全球秩序不断加速变化，世界社会经济发​​展的深层次问题逐渐凸显并错综复杂，阶级矛盾和民族冲突日益激烈，全球贫困人口急剧增长，各个国家与区域之间的贫富差距也在不断扩大。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中国而言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二、从“三个逻辑”读懂共同富裕的深刻内涵

（一）从历史逻辑看，共同富裕是中华民族的时代追求

从古至今，“天道均平、抑强扶弱、均富贵”的理念已成为中华民族的价值追求，内化于国民的血脉之中。

首先，共同富裕是古代“天下大同”思想的现代阐释。例如，老子“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的分配思想、孔子“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治国思想、管子“与天下人同利”的治国主张、晏子“权有无，均贫富”的治国建议等，这都体现出在古代中国所追求的社会资源的配置中既有贫富差距，也不相对悬殊的经济观念。

其次，共同富裕是历代农民运动反对剥削的斗争纲领。张角发动黄巾起义时，“致太平”的思想便被清晰地阐述；王仙芝和黄巢推动“均平”的政治理念；李自成把“均田免赋”作为其行动指南；太平天国运动则明确提出“均贫富”，以“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钱同使，无处不平均，没有不饱暖”为主旨，这些诉求都充满了古代农民对“均贫富”的理想追求。

再次，共同富裕是近代革命先驱孜孜追

求的政治理想。近代百日维新的康有为、梁启超等，均深受大同思潮影响，康有为主张建设一种“个个相亲，个个公平”的大同社会的理念，孙中山把“民生”视为三民主义理论的重点内容等。

（二）从理论逻辑看，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要求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方式将以全人类的共同富有为目的。《共产党宣言》也说明了“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无产阶级的政治运动是代表大多数人的意志，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自主的体育运动”^[2]。上述关键观点深刻阐述了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目标。列宁认为，无产阶级要把私有制变为公有制，继而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达到社会共同富裕。

（三）从实践逻辑看，共同富裕是初心使命的生动诠释

新中国建立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领导人确立了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并第一个明确提出共同富裕理论。一九五三年，毛泽东就明确提出了“共同富裕”的概念^[3]，旨在引领“广大农民走社会主义农业生产合作化道路，从而达到城市工人生活水平过程和结果”^[4]。

共同富裕思想在邓小平同志那得到系统阐述。在改革开放探索过程中，邓小平始终不忘共同富裕思想，并把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优越性最充分的体现。他在总结社会主义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对共同富裕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提炼，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

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5]，以及先富带动后富的思想。邓小平同志的伟大贡献在于抓住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集中到一点，就是共同富裕。

在随后的历史进程中，江泽民和胡锦涛同志都分别对共同富裕进行了阐述。江泽民同志强调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兼顾效率与公平，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6]。胡锦涛同志强调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指出把维护社会公平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7]。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实现共同富裕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党的十八大刚结束，习近平总书记便在十八届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时明确提出，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理念^[8]。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明确提出通过共享发展理念引导全体人民为了共同富裕而努力^[9]。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提出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的目标，要求“必须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共同富裕”再一次被郑重提及，意味着共同富裕将从文件走进现实，这次会议以及之后的《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这篇文章，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同富裕相关重要论述的集中体现。

从上述中可以得出，中国共产党所讲共同富裕有其独有的特征。首先，从覆盖面看，共同富裕应该是全面富、全民富、全域富，而不是几个人或少数地区的富裕，共同

富裕路上“一个也不能少”。第二，从内容上看，共同富裕不单单是谈钱的事，它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多领域发展要求，是“富脑袋”与“富口袋”的有机统一。第三，从路径上看，共同富裕不是回到吃“大锅饭”的老路上，是大家一起干、一起分享的共同富裕。第四，从步骤上看，实现共同富裕，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必须付出持之以恒的努力，不能“一口吃成胖子”。

三、从“三个关键”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路径

共同富裕具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词，第一是富裕，第二是共享。现在的现实情况是，一方面没有达到足够的富裕程度；另一方面，共享程度不是很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差距。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要把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其中的一个首要的任务，特别是推动高质量发展。

共同富裕是高质量发展的根本目的，高质量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两者辩证统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因此，只有毫不动摇坚持高质量发展，使发展成果人人享有而不是少数人共享、一部分人共享，才能激发群众内生动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提供持续动力源泉，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

（一）促进共同富裕，要依靠“一个根本”

中国共产党是最高政治力量，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最高政治原则，这是对坚持党的领导最新认识，是全党共识，也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实践经验的深刻总

结。在人口如此众多的国家实现共同富裕，是一项宏大、伟大且复杂艰巨的事业，如何做好这项工作，根本前提就是坚持党的领导。

共同富裕是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目标的必经阶段，是一代代共产党人之为奋斗的宏伟目标。翻开中国近代史，中国近代无数有志青年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阶级、不同的目标出发尝试救国图存，但无一例外纷纷失败，只有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用先进科学思想武装自我，坚持人民利益至高无上，才使中国走上了独立自主道路，才使中国人民摆脱压迫、翻身做主，实现人民共同富裕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细数辉煌成就，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从贫穷落后走向繁荣昌盛，并且还要不断地引领中国人民走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未来。因此，只有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作用，才能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真正推动共同富裕。

（二）促进共同富裕，要坚持“四个原则”
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总书记指出要准确

把握四条原则：“一是鼓励勤劳创新致富；二是坚持基本经济制度；三是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四是坚持循序渐进”^[10]。

1.鼓励勤劳创新致富。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理论强调，只有劳动才能创造出人们赖以生存的生产生活资料，才能提供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劳动是人的本质要求，也是衡量价值大小的标准。“鼓励勤劳创新致富”的论断，来源于中华民族勤劳朴实、吃苦耐劳的传统美德，来源于人民创造历史的科学论断，来源于实现共同富裕任重而道远的现实要求。要反对“养懒汉”，鼓励合法经营，从而营造更加积极健康的社会环境，才能将发展的“蛋糕”做大，为推动共同富裕提供强大的动力。

2.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充分发挥制度优势是推



进共同富裕的制胜法宝，正因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克服了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固有矛盾，从根本上解决了“富者越富、贫者越贫”的分化问题，才能从制度上保证能够更好的满足人民群众生活需求，从而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既强调生产做大“蛋糕”，又要强调分配好“蛋糕”，使各个群体都实现发展。在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原则下，不断完善二次、三次再分配的制度体系，统筹处理好政府、市场、个人三者的矛盾，才能在有限的条件中激发所有人的生产积极性，逐渐形成“中产阶级占多数，富裕与贫困人口占少数”的橄榄型的分配结构，在稳定中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目标扎实迈进。

3.尽力而为量力而行。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础是辩证唯物论，唯物论中物质决定意识的真理决定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的方法论是共产党人一以贯之的重要思想。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我们不能做超越阶段的事情，但也不是说在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方面就无所作为，而是要根据现有条件把能做的事情尽量做起来”^[1]。在推进共同富裕的过程中，不能好高骛远、过分追求，更不能裹足不前、铤施两较，要把重点放在民生保障、经济发展、普惠群众的基础工程上，永葆循序渐进，久久为功的韧劲，才能在促进共同富裕的征途中行稳而致远。

4.坚持循序渐进。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艰巨且漫长的过程，它必须建立在物质极大丰富和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前提下，这就要求必须把实现共同富裕看作是动态中向前发展的过程，将目标与过程统一，要以“办好这件

事，等不得，也急不得”、“积小胜为大胜”、“一步一个脚印”的方法，循序渐进，将所有事办好，才能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三）促进共同富裕，要缩小“三项差距”

一是着力推动城乡协调发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要不断强化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聚焦道路、饮水、住房、环境整治、公共服务、物流站点等“硬件”设施持续发力，补齐人工智能、智慧农业、物联网等“软件”节点，推动农村经济与城镇发展融合交汇。要培育壮大新时代农民群体，不断提升农民的理论素质和专业技能，通过多渠道培训，提高农村居民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武装传统农业的能力，教会经营管理特色新型农业的方法，切实发挥农民在乡村振兴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要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充分利用农村低效闲置土地，解决乡村产业发展用地紧缺的问题，引导土地所有权有序流转，凸显集体产业整合资源、集中经营、共享红利的优势，更好地发挥集体经济促进共同富裕的作用。要打通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堵点，实现城乡优质公共服务资源的均衡配置和开放共享，持续增强农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二是着力推动区域协同发展，缩小地区发展差距。习近平总书记在《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一文中指出，“不能简单要求各地区在经济发展上达到同一水平，而是要根据各地区的条件，走合理分工、优化发展的路子，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要破除各种封闭小市场、自我小循环，使劳动力、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在生产、加工、销售

环节自由流通，加快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才能更好发挥各区域比较优势，推动东、中、西部地区协同实现产业转型升级。

三是着力推动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缩小居民收入差距。中等收入群体在扩大内需、提高生产率和社会政治稳定中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规模不足或者时间推后都会影响经济发展速度。因此，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缩小差距、提高效率的直接手段。首先，要提技能。要持续实施技能人才培养计划，完善稳岗、扩就业系列措施，让技术工人、进城务工人员、高素质农民、高校毕业生等中等收入群体工资性收入稳定可持续。第二，要抓产业。要不断提高制造业水平和规模，大力支持生产性服务企业，以更高的生产效率和更高的劳动报酬，做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第三，要保兜底。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稳步提高城乡低保标准，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第四，要优化税制，合理分配劳动所得和资本所得税负比重，国家要适时推出房产税，以更有力的举措缩小财产性收入差距。

参考文献

[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EB/OL].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

2022/1026/c1024-32551597.html, 2022.10.26.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11.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584.

[4]胡鞍钢,周绍杰.2035中国:迈向共同富裕[J].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1.

[5]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3.

[6]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540.

[7]胡锦涛.胡锦涛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624.

[8]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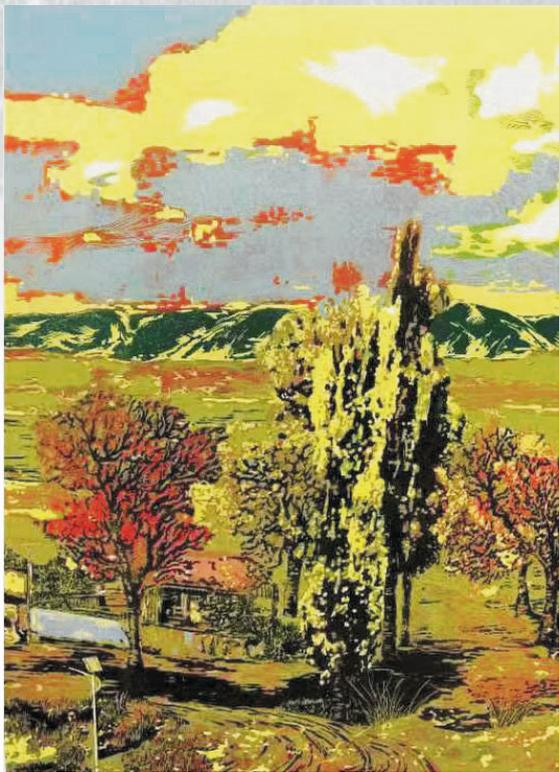
[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793.

[10]习近平.扎实推动共同富裕[J].求是,2021.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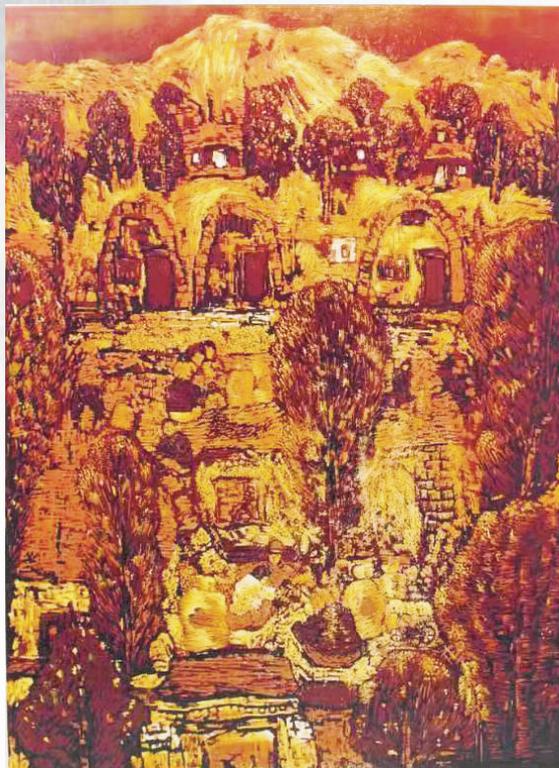
[11]习近平.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5.10.

作者系江西省中共修水县委党校讲师

责任编辑:陈宝华



■ 《乡色（绝版套色）》/杨晓丽



■ 《忙秋（绝版套色）》/伏晓娟



■ 《繁华似锦（粉彩版画）》/刘仁



■ 《菊韵（粉彩版画）》/马玉香



■ 《黄河在这里流过（黑白版画）》/王存福



■ 《山风（黑白版画）》/田晓宾

文化自觉与文化反思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形成路径选择

◆ 袁 磊

摘 要：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从领袖群体、组织制度、纪律要求、指导思想、根本宗旨、精神作风等全面走向成熟，在文化复兴思潮与民族爱国主义情绪双重合力之下，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传统文化及自身政党文化表现出集体的自觉自省与理性反思，并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探索其政党文化根植性的途径与方式，构建起了以民族的格局胸怀、马克思主义的制度规范、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艰苦奋斗的意志品质、实事求是的集体人格以及“三大优良作风”的形象气质为基本表征的政党文化话语体系，探索形成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建构特有范式，这对于新发展阶段下推进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建设及强化国家文化软实力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延安时期 政党文化 文化自觉

从中国共产党百年的发展历程来看，一部百年党史就是一部“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历史，中华大地也经历了历史性沧桑巨变，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源于我们党是一个始终保持对文化的高度自觉、自信与反思，始终保持核心文化的先进性。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1]。文化自信或文化自觉均以对淡出人们视野的文化的理性反思为前提和基础的。从本质上来说，文化自觉与文化反思就是通过对文化根脉的寻找与继

承、对文化真理性的批判与发展、对文化发展趋向规律把握与引领基础上的进行文化文明的互鉴、传续与再造的动态过程。中国共产党最初是以反传统登上历史舞台的，在其意识形态上表现出与中国传统空前的决裂，一段时间内以“过激主义”政党秘密存在着。在中国共产党一大党章中就有着“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2]等一系列革命性话语清晰表述，在这些表述中囊括了党的性质、纲领任务和组织纪律等政党制度性要素，初步确立起了以马克思主义制度性规范要素为核

心的革命型政党文化系统。经过长期的战争考验、道路抉择、思想碰撞，其政党文化不断进行着适应、再造、创新、发展、完善。进入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领袖群体、组织制度、纪律规范、指导思想、集体人格、宗旨作风等全面走向成熟。并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对中国传统文化及自身革命文化表现出集体的自觉自省与理性反思，开始思考探索其政党文化的根植性途径与方式，即如何与民族传统文化融会贯通。本文将循着这样的思路，进一步梳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政党文化建构范式及其对当下我们政党文化建设的参考价值。

一、延安时期中国共产政党文化的形成逻辑

现代政党通常都会根据自身所处的历史方位和时代背景的具体要求，对所涉及的文化形态进行必要的创新和再造。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表现出了马列主义政党的鲜明特色，其政党文化在形态上天然的有着马克思主义基因的根植与延续。伴随着中国革命的实践活动的深入发展，其政党文化也根据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等不同时期的历史使命进行着适应性创新。大革命时期，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历史境遇下中国共产政党文化彰显出了其包容开放的特性，三次修订党章，各种规章制度趋于规范，但一切均服从、服务于国民革命。当时在国统区的《社会新闻》曾一针见血指出，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自身文化宣传工作，但在其“组织形成之后，所有的共产宣传都寄生在国民革命的旗帜之下”。这也从一个侧面暴露出大革命时期中共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自身组

织建设与领导工人运动上，根本无暇顾及文化建设问题。1927年经历了国民党“清党”“分共”的血腥大屠杀之后，大批的共产党人在“睡梦中”被推向了死亡的边缘，血的洗礼促使中国共产党人猛然醒悟，及时将资产阶级背叛大革命的愤怒转化为用文化的武器来捍卫革命，重新估量其政党文化在党内与党际间的解释宣传功效，实现中国革命道路由走“城市中心论”到“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转变，重新整合党内政治资源，“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成为党内唯一一致性共识。从此开始了以革命的武装反抗武装反革命的漫漫征程，其最具表征性的政党文化也进行着适应性调试、创新与再造。就世界范围来看，一般的国家均因革命失败而导致革命文化的凋谢，而中国的情形则尤为独特，却因大革命的失败而催化助长了革命文化的兴盛。一扫大革命失败后的悲观主义情绪，遍布全国的农村革命根据地政权如雨后春笋般的拔地而起，白区与红区、城市与农村各级党组织得到普遍性地恢复与发展，中国革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燎原态势。与此同时，也构建起了以土地革命为背景的中国共产政党文化话语表达系统，以期通过广泛的宣传推介来唤醒、改造民众的国民性，诸如“打土豪分田地”等一系列具有土地革命色彩的话语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有效的解释，搭建起与底层民众沟通的桥梁。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不仅仅党员人数由1937年的4万人增长到1945年的121万人，而且中国共产党从一度时期具有浓重苏俄色彩的无产阶级政党逐渐发展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无产阶级政党，党全面走向成熟，这也预示着中国共产政党

党文化完全形成，一个成熟的政党必然有其完备的文化形态与之匹配。中国共产党人也经历由与中国传统的彻底决裂逐步走向对民族传统的依恋与复归，在全心全意为人服务根本宗旨的形态化过程中，赋予其政党文化更多的民族色彩、民族气质，形成一种融民族特色与马克思主义因子于一体的政党精神文化品格，并借助于民族语言对中共的合法性进行着必要的解释。对于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文化形成逻辑与根植性的探究，须着重从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所处的时代方位、时代背景和所肩负的职责使命中去寻根溯源。

其一，延安时期中国社会进入了新阶段。就国内现实形势发展而言，中国社会进入了抗日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发展的新阶段。这一新阶段最突出、最大的特点就是“由国内各党派各阶级互相对立的局面转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由国内战争转到了抗日战争”^[3]。1939年5月4日，毛泽东在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大会上对抗战进行了总体性研判分析，认为“目前的抗日战争是中国革命的最伟大、最活跃、最生动的一个新阶段”^[4]。面对着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团结起来，抵御外侮成为中国社会的基本共识。中国共产党人沿袭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修齐治平的士大夫精神、先天之忧而忧的忧患观以及天下为公的理想追求，以真诚的民族觉悟，在生死存亡的长征途中就打出了“北上抗日”的旗号，落脚陕北之后，在瓦窑堡会议上适时实现党的战略策略转变，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在宣传提纲中明确将“动员一切力量

争取抗战胜利”作为今后的任务，及时对外公布了“抗日救国救民二十条主张”，并通过致信国民党高级将领、致信社会名流贤达、对外发表抗日宣言、致国民党书、发布抗日先锋军布告，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将苏维埃共和国改为民主共和国，真诚呼吁“站在抗日的最前线，为保卫祖国流最后一滴血”^[5]，极力促成“全中国形成了一个空前的抗日大团结”^[6]；就国共两党党际关系来看，为了抵御外侮，共产党抛弃前嫌，积极寻求与实现国共第二次合作，完成红军改编，奔赴华北抗日最前线，公开发表宣布以三民主义为基础与国民党精诚团结共赴国难宣言，实现与国民党第二次合作。与此同时，也构建起了全民族抗战背景下的以民族大义为基础的、融爱国主义与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于一体的政党文化话语体系，抗战成为激发中国共产党文化形成的主要外部因素。

其二，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传统文化表现出集体自觉与反思。随着革命的深入发展，对马克思主义的神圣化、教条化理解趋向日益加剧，脱离中国实际右的、“左”的错误接踵而至，中国革命几乎到了濒临被葬送的边缘。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回头看，回望、反思走过的路，评估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功效问题，探索政党文化的根植性途径与方式，集体意识到离开中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只能是空洞和抽象的。1938年7月26日，张闻天在抗大第三期毕业学员典礼上发表了《论待人接物问题》的演讲，在党内首次就如何继承和发扬民族传统进行阐述，他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运用须与中国人所具有的民族的、社会的、历史

的、文化的、习俗的各种传统和特点相适应。在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一时代命题，因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为我们留下了极其丰富的文化遗产，探寻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融会贯通的方式成为了必然选择。运用中国特有的话语对马克思主义现代理性进行中国式的解读与释疑，并赋之一定民族的、历史的、文化的形式与方式，为中国普遍的、多数的民众所接受。1940年1月9日，在边区文协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再次强调，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中国创造了灿烂的、悠久的古代文化与文明，对待与清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应秉持的态度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他认为这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7]。经过延安整风的整合、净化、融合之后，涤除党内非马克思主义的异质文化碎片，实现了政党文化在中国传统话语体系中的再造、创新，对家国一体的宗法政治观念加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改造，形成了无产阶级集体主义道德原则。把忠孝节义的传统道德改造为抗战服务的思想文化，形成了“对国家尽其至忠，对民族行其大义”的马克思主义忠孝观。把传统的民本思想升华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密切联系群众的群众路线。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是对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传统和辩证法的扬弃。把农民的质朴本色化为艰苦奋斗的作风，把对君子人格的理想追求具体化为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对党的最高纲领也有着深刻的影响。总之，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赋予中国传统文

化中的天下为公、家国同构、民本思想、舍生取义、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等价值观新的时代寓意，实现了民族智慧与现代理性的融合融汇，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集体自信、自觉、反思成为促使其政党文化形成的内部因素。

其三，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肩负着反帝反封建和自我革命与革新双重历史使命。现代政党组织参与政治实践的主要目的就在于获取、运用和维护国家权力。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局部执政，践行着基于“三三制”民主制原则下的权力运作模式，但究其职责与使命来看，依然是革命型政党，以革命、革新为第一要务。因中国长期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作为中华民族最先进分子的中国共产党人自然承担起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以及现阶段的和将来阶段的双重革命任务^[8]。为实现民族独立与民主建国双重任务，对内要“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必须进行自我革命革新，通过出台《关于巩固党的决定》《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等，调整中央领导机构，确定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规定书记处讨论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权，从组织程序上确立毛泽东的核心地位，推进实施党的组织制度建设、延安整风运动系统化的党内教育、厉行廉洁政治等“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方法步骤，时刻保持革命党人的斗争精神。对外必须进行反帝斗争，以求得民族独立与解放。挺进抗日最前线，实施游击战争战略方针，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承载起全民族抗

战的希望。正如陈毅《过太行山抒怀》长诗所称颂：“山西在怀抱，河北置左肩。山东收眼底，河南示鼻端。长城大漠作后殿，提携捧负依陕甘。更有人和胜天时，地利攻守相攸关。创业不拔赖基地，我过太行梦魂安。”热情讴歌我党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英明决策。因为中国共产党人是真正的行义者，时刻准备着为国家尽其至忠，为民族行其大义。中国共产党人这种高度的民族自尊心与责任感也是促使其政党文化形成的不可或缺的因素。

二、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核心要素

目前，就国内学界来看，关于政党文化核心要素叙述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有：意识形态说、政权意识说、政党意识说、政党价值观说和政党宗旨说。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虽实现了在陕甘宁边区及各解放区的局部执政实践，但从党的使命来看，属于革命型政党，党的根本任务是革命，即推翻旧有的国家政权，即使在局部取得了执政实践，其革命实践依然服从或服务于党的整体革命，带有强烈的革命党的特性与特质，党所具备这样的革命性特性必然映射到其政党文化。从政党文化的视阈来看，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表现出对新民主主义的政权意识的集体觉醒与笃志追求，也有着对无产阶级政党所具有的价值观念的培育与延展，这些都无法全面反映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所代表的组织主体和限定的场域。唯有政党宗旨能够更直白、更具体、更形象的表述革命型政党的价值所在。人民至上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来最重要最成功的经验总结，也是中国

共产党性质宗旨集中体现。延安时期所形成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是中国共产党公共价值导向与党员自身价值追求的有机统一体，凝结着党的本质属性、目标利益、精神气质、人格力量、形象作风等实质性内容，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最为核心、最为稳定、最为突出的要素。

其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人初心使命的本质要求。从历史维度来看，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下和近代以来屡遭列强欺压蹂躏、军阀割据纷争的历史长河中，中国人民屡遭生灵涂炭、民不聊生、流离失所，人民基本的权利与利益无法得到应有的保障，独立的人格与人性在封建礼教的束缚下消失殆尽，中国人民长期处于无组织状态，中国社会犹如“一盘散沙”。从实践维度来看，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之日起，就自觉肩负着拯民于水火的历史的、民族的、时代的重任，所从事的一切革命活动，始终以谋求民族解放、国家富裕和人民安康为己任，使民众真正获得人格的独立和个性的自由解放。因为“共产党员是一种特别的人，他们完全不谋私利，而只为民族与人民求福利”^[9]。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是中国革命的唯一目的性，也是中国共产党人自然的自觉的行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关系民心向背，不仅仅是中国共产党人初心使命的本质要求，更是延安精神、延安作风、延安形象最真实、最朴素、最直白的表达。

其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与人民伦理关系的集中反映。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是党与人民伦理关系的内在规

定性，集中体现的是自我立场、党的宗旨、工作方法问题。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陕甘宁边区这块“新民主主义试验田”里将党的根本宗旨演化为“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10]的群众路线与群众工作方法，将几千年来一直游离于中国政治之外的民众有序组织起来，结束了中国社会的无组织状态，构筑起人民群众的铜墙铁壁。党的领袖毛泽东要求全体共产党人时刻要有眼睛向下看的兴趣与决心，在中共七大《愚公移山》的闭幕词中，把“人民群众”提到了“上帝”的高度去看待，提醒中国共产党人务必时刻信仰与依赖。一位有着特殊情愫的国际友人史沫特莱曾坦言：“在他们的身上，一个全新的成份进入了中国社会”^[11]。“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仅是中国共产党评价评判的道德遵循，更是衡量一切工作的基本标准和价值取向。

其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广大党员最基本的道德规范。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对党的性质精准把握和深刻理解的基础上，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确定为全体党员必须遵循的根本宗旨，必须以党的宗旨作为一切思想言行的出发点和归宿，“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三分之二心三分之二意为人民服务”^[12]，从而培养一大批信仰如磐、信念坚定、情操高尚、德才兼备、有益于人民的“新人”，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德行，也是为人民服务内化于心的自我修养和共产党人党性纯粹与纯洁的见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使命所在、情怀所系，是全体党员必须遵从的基本道德规范。

三、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评价尺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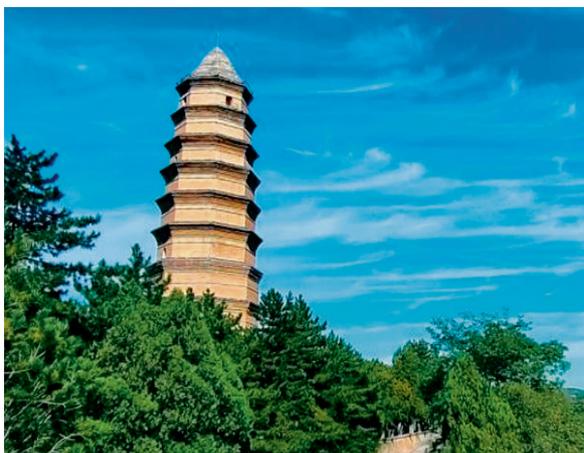
“政党文化的评价尺度是政党形象和政党格局”^[13]。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作为革命型政党的外化形态，其评价尺度具体展现为“延安作风”与“延安格局”。从根本上来说，这是党的宗旨的具体体现。其一，形成了以“三大优良作风”为主要标识的延安作风。毛泽东是党风的集大成者。1940年秋，就曾提出要养成一种新的作风，即延安作风。在1942年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对党风问题进行阐述，认为党内存在的宗派主义，以及学风和文风都是党风的具体表现形式^[14]。在中共七大上高度概括了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实践中所表现出来新的工作作风，即：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在具体革命实际工作中，将“三大优良作风”转化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践行群众路线、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工作方法，这是我们党实事求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政党品格的集中体现，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延安实践范式；其二，形成了胸怀天下、心系苍生的延安格局。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延安的窑洞里不仅出马列，更有格局胸怀、有战略眼光。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站在延安的山沟沟观天下大势、放眼世界。随着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为了民族独立、国家尊严、人民自由与幸福，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人站到了抗日战争的最前线、最坚决、最勇敢的为民族独立而斗争，“在毛泽东新的领导下，共产党成为反对日本侵略中国的爱国情绪的最有效的发言

人”^[15]。另一方面，高举爱国主义旗帜，摒弃前嫌，聚合国内各种爱国力量，塑造“同仇敌忾，求同存异，一致对外”的政党格局胸怀，构建起了全民族参与抗战的民族格局和民族胸怀，因为此时中国“唯有合群奋斗，驱逐日本帝国主义，才有生路”^[16]，表现出在民族大义、在亡国灭种关键时刻的高度的民族意识、真挚的民族情感和远大的民族视野。

四、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党文化传递路径

所谓政党文化就是政党组织在对政治权力的认知、攫取与行使行使过程中所形成的为全体党员所一致认同的价值体系和认知系统。政党文化作为一种政治文化，其终极目标在于造就、塑造、培养一种超个体的群体集相和集体人格。就党内而言，就是要剔除党内的异质文化碎片，从而凝聚起党内一致性共识，达到聚合内部合力的功效；就党外而言，就是通过政党文化的社会化途径，实现社会大众的普遍性认同，达到对执政合法性解释的功效。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制度化的党内干部教育和新闻媒介与典型引领构建起了其文化的传递路径，将党的格局胸怀、意志品质、价值观念、制度规范、集体人格、作风形象向普通党员和社会大众宣传、灌输、渗透，实现了其政党文化有效地传递与传播，构筑起广大党员与普通民众对我们党的政治信仰与政治认同。

第一，通过制度化的干部教育凝聚党内共识。延安时期，面对干部队伍中普遍存在文化水平低、本领恐慌、马克思主义修养不高、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的自觉性不够等现状，在1938年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



东提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17]，并倡导“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18]。基于亟待培养大批德才兼备干部的现实考量，1939年2月1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成立由毛泽东、张闻天等15人组成中央干部教育委员会，负责统筹全党范围的干部教育工作。并成立了对干部教育工作具体领导与管理机构——干部教育部。从1939年到1942年，先后出台了一系列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决定、通知等文件，搭建起了适应于民族抗战为己任的战时干部教育制度体系。兴办中共中央党校、抗日军政大学等一系列干部学校。通过实施系统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提升干部运用马列主义的理论和方法观察、研究、处理问题的能力与水平，坚定党员干部树立为民族解放、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决心意志，全面提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和共产主义崇高政治修养，实现在马克思主义轨道上的高度认同；实施严格的党性党纪党风教育，通过常态化学习和延安整风运动，涤除党内存在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个人英雄主义、闹独立性、山头主义、家长制等各种非无产阶级异质文化碎片，有效协调个人自觉理性与制度规约之间

的冲突，有效保障了党性的纯洁与先进，实现党在思想、政治、组织、行动上的步调一致性；实施党的宗旨教育，通过价值倡导、情感沟通、形象塑造等构建党员的行为模式，匡正党员的政治行为，防止党员的行为偏离为人民服务的价值旨归，确保党员遵循党的根本宗旨彻底性与真实性；实施专业技术与基本国情教育，遵照“做什么、学什么”的原则，学会与业务实际的调查研究，研究相关政策法令，研究具体的业务经验，研究业务的历史知识，掌握业务的科学知识，以期达到学会与精通业务之目的。除此之外，还要进行必要的国情教育。总之，延安时期通过制度化的干部教育，培养造就了一大批具有高度政治自觉、治党治国治军亟需的革命英才，为我们党储备丰厚的人力资源。

第二，通过大生产运动锤炼政治修养修为。延安大生产运动是我党在局部执政条件下一次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模范边区的成功实践，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学做革命家务的成功范例。延安时期面对敌人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在生死存亡之际，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军民展现出了中国共产党人集体自我觉悟觉醒，把救亡图存的基点放在自身之上，发扬舍我其谁的革命英雄主义传统，不怕牺牲、不惧困难、自立自强，积极开展轰轰烈烈的军民生产自救运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上至领袖，下至普通民众全部组织参加战时生产，积极执行“南泥湾政策”，公私兼顾、军民兼顾、组织劳动互助，干在实处，争在前头，开拓创新，奉献自我，在陕甘宁边区这块新民主主义试验田上，对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进行有益的探

索。组织开展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运动，各行各业英雄辈出，有农业战线上的吴满有、工业战线上的赵占魁、合作社战线上的刘建章、机关的黄立德、军队的李位、抗属陈敏、退伍伤残军人杨朝臣，还有打盐的高仲和、植棉的郭炳仁、畜牧的贺保元、种稻的马海旺、妇女郭凤英、模范工程师沈鸿等。短短几年间，实现了粮食、经费的自给、半自给或部分自给，陕甘宁边区度过了财政经济严重困难期，不仅创造了丰硕的物质成果，奠定了持久抗战、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物质基础。而且创造了丰厚的精神食粮，给我们留下了不畏任何艰难困苦、勇于战胜一切强敌对手的宝贵精神财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南泥湾精神，也坚定了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的自信与底气，更将信仰如磐石般坚固的政治修养修为具体化、实践化、形象化，中国共产党人真正在思想上觉醒、政治上成熟、行动上自觉。

第三，通过新闻媒介与典型引领实现普通大众的一致认同。延安时期在宣传报道上探索形成以党报为核心的，由报刊及通讯社、广播电台所组成的报刊宣传网络，突出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与根据地建设，把党中央的决策、革命的战略与策略、民众的呼声、胜利的决心意志有效向国内国际传播，有效发挥了新闻媒介的告知、劝服、教育、引导的功能，达到了启蒙、唤醒和改造边区民众的民族意识之目的。通过树立典型形象，发挥模范人物引领示范功效。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老三篇”中塑造的白求恩、张思德、

愚公等光辉形象，向普通大众有效传达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价值旨归和“把中国引向光明”^[19]的奋斗目标。利用“毫不利己专门利人”^[20]，“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21]，“要奋斗就会有牺牲”^[22]等一系列大众化语言，鼓舞士气 凝聚人心，系统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也实现了其政党文化社会的、大众的认同，为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进行有效的解释与宣传。

总之，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局部执政的具体历史境遇下，探索形成了一系列治党治国治军的成功经验，培育形成了以延安精神、延安作风、延安形象、延安胸怀等具有延安时期革命话语特色的政党文化形态，探索形成政党文化建构的延安范式，在革命话语的高地上彰显了政党文化独有的张力与软实力，也从政党文化的视角给予中国革命成功的延安之路必要的、有效的关怀与释疑。当下，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正在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国际格局加速调整、演变，以及所引起的文明与文化的碰撞、冲突，对于我们这样一个超大型执政党全面从严治党和治国理政都提出了新挑战、新要求。总结和借鉴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建设的成功经验，对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守正创新与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仍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重要论述选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9：232.

[2]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3.

[3][17][18]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558,648,657.

[4]毛泽东年谱：中卷(1986-1949)[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24.

[5][7][8][20]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57,707-708,651,659.

[6]史沫特莱文集：中国的战歌[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560.

[9]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60.

[10][12]毛泽东著作选读[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569,800.

[11]斯特朗文集（第3卷）[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8：7.

[13]柴宝勇，黎田.政治文化、政党文化与党内文化关系辨析[J].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5.

[14][19][21][22]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12,1103,1104,1101.

[15]马克·赛尔登.革命中的中国[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83.

[16]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72.

作者系陕西延安干部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陈宝华

推动基本培训落地落实的 意见建议

◆ 魏 杰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健全常态化培训特别是基本培训机制，强化专业训练和实践锻炼，全面提高干部现代化建设能力。党校全面落实基本培训要求，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的务实之举，是全面贯彻落实《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和《干部教育培训规划（2023—2027年）》的生动实践，是加强新时代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基础工程，决定党校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底色和成色。奋进新征程，党校必须坚持正确的办学方向，始终坚守党校姓党的初心使命，把质量立校作为党校工作的重要遵循，凝聚创新发展动能，聚焦教研质量和治校水平整体提档升级，增强培训时代性、系统性、针对性、有效性，以高质量的基本培训牵引带动党校建设规范化、特色化发展。

一、深刻领悟基本培训科学内涵，始终保持“党校姓党”政治定力

开展基本培训是党中央对做好党校教育培训工作的具体部署，是提升党校办学水平和从严治校的现实需要。党校要认真落实基本培训的各项工作要求，深化对基本培训的规律性认识，全方位提高办学质量，推动基

本培训在干部教育培训中落实落细。

一是注重规划布局，在持续优化上下功夫。坚持把学习贯彻全国、北京市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精神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特别是在中央党校建校9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同贯彻落实《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和《干部教育培训规划（2023—2027年）》结合起来，在整体上准确把握，在贯通中深刻领悟，理清发展思路，提升发展理念，深化理解基本培训的内涵和要义。党校要将基本培训的目标要求与党校教育培训体系深度整合，突出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主线，突出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能力培训三个重点，紧扣教学质量提档、科研水平提升、咨政能力提高的发展目标，增强做好新时代党校工作的使命感、责任感。

二是突出培训重点，在对标看齐上下功夫。党校要全面对标新要求，严格按照《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和《全国干部教育培训规划（2023—2027年）》规定，统筹推进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科学设置培训单元，优

化培训内容、培训方式、培训学制、培训保障，切实增强培训工作的针对性。做好新时代党校工作，必须坚持“党校姓党”不动摇，弄清楚学员“到党校培训为什么来、到党校来学习什么、到党校该怎么学习”的根本性问题，是统领党校工作的总纲主线。基本培训要紧贴党委政府的中心任务，聚焦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向实践性、针对性发力，推动理论收获与实践经验良性转化，帮助学员补短板、强弱项、提能力，确保干部教育培训工作高质量发展。

三是把握时代需要，在联系实际上下功夫。党校姓党，决定了党校教育培训工作的重心必须是抓党的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新时代新发展，基本培训最重要的是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强基固本，增强理论教育的系统性、整体性，引导学员领悟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党校是教育培训党员干部的主渠道，是学习、研究、宣传党的理论的主阵地，要深化理论研究和对策研究，紧扣理论和实践创新前沿，围绕实践遇到的新问题、新难点、新矛盾，深入开展应用性研究，努力在理论研究、宣传阐释、建言献策上出成果，推动研究成果进课堂，在教学中做到讲全讲准，力争讲深讲透，结合实际打造更多精品课程。

二、扎实推进培训内容落地生根，努力夯实“为党育才”阵地堡垒

开展基本培训应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聚焦党员干部“七种能力”展开培训，帮助党员干部填知识空白、补素质短板、强能力弱项，用党性锤炼

促进政治坚定，以理论武装促进创新发展，培养堪当时代重任的党员干部队伍，不断筑牢为党育才“主阵地”。

一是贯彻主题主线，增强培训内容吸引力。基本培训要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主题主线，打造“理论教育、现场教学、实践锻炼、案例警示”等一体化教学模式，构建系统完备、特色鲜明的课程体系，推进研讨式、模拟式、体验式等教学方式创新，提高学员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党校要发挥好主阵地、主渠道作用，在培训内容上做到突出主题、深化主线，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引导学员增进对党的创新理论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二是理清思路需求，突出培训形式多样性。开展基本培训有利于推动形成全党大学习的浓厚氛围，增强党员干部的思想共识和行动自觉。基本培训要紧紧围绕党的中心任务，紧扣教育培训对象，科学设置培训内容，灵活运用培训方式，培训周期目标要合理，有计划地开展基本培训，从源头上规范培训班次的关键要素，根据不同培训班次特点，选用“线上+线下”“课堂+现场”等培训方式，综合运用讲授式、研讨式、案例式、模拟式、体验式等教学方法，逐步完善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党风党纪和廉洁教育为一体的课程体系，增强教育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三是结合区域特色，立足培训资源本土化。基本培训要聚焦创新打造本土化品牌化

载体，努力推动党员干部接受经常性教育，持续提升培训工作质量和成效。党校要围绕时代需要，聚焦不同班次和学员特点，打造差异化素质能力培训体系，突出数字经济、意识形态、基层治理、接诉即办等与群众生活贴近的课程，核心是提升服务群众的能力。同时，党校要坚持把严以治教、严以治学作为强化基本培训的重要保障，深入开展“双提升工程”，加强党校队伍建设，严格责任担当、严格政治纪律、严格师德师风、严格学风校风，全面提升办学治校水平，为推动党校基本培训高质量发展提供保障。

三、充分发挥师资队伍引领作用，着力推动“为党献策”智库建设

开展基本培训是加强新时代干部教育培训、推动党校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工程。党校教师要讲好课做好科研，传递党的声音，着力解决学员心中的疑点难点问题，力争在认识上先行一步，在理解上学深一步，努力做有理想、有道德、有学识的党校教师，始终践行党校教师的初心和使命，

一是锤炼党性修养，争当政治过硬的党校教师。党校是政治学校，特殊的性质决定了党校教师必须坚定理想信念、对党绝对忠诚，争做爱岗敬业、勤奋好学、能力精湛的“传道者”。党校教师不仅要精于“授业”、“解惑”，更要以“传道”为责任和使命，强化示范引领作用，做信念坚定的党校教师。坚定理想信念需要有深厚的理论支撑，否则，在思想上、行动上就会有所动摇。作为党校教师肩负着教书育人的重任，代表的是党的立场，发出的是党的声音，展示的是党的形象，教学中会产生示范效应，

所以要时刻绷紧政治这根弦，持续增强党校姓党的自觉性。

二是坚持潜心治学，争当本领高强的党校教师。党校教师要围绕教学重点、列出教学清单，带头学深悟透党的创新理论的精髓要义，利用碎片化时间，进行集中交流研讨、评课打磨、相互分享，做到知其言更知其义、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真正把握好、阐释好党的创新理论的道理，不断拓宽视野，增强学习效果，真正达到启发思想和指导实践。党校教师要始终保持对党校课堂的敬畏之心，围绕党和国家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以及学员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用扎实的知识功底、过硬的教学能力、勤勉的教学态度、科学的教学方法，帮助学员解决理论上和思想上的困惑，始终紧贴社会实践、密切联系学员，避免授课出现“假大空”现象。

三是增强自律意识，争当奉献有为的党校教师。师德是党校教师的立身之本。党校教师要牢记党校教师身份，注重自身修养，遵守学术规范，授课既要把宏观与微观、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更要有政治站位、正确观点，以自己的言行举止影响学员，做遵规守纪的党校教师。党校教研工作要围绕现实需要进行攻坚，党校教师要努力践行“四下基层”优良传统，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和学术探讨，找准问题症结所在，提出务实管用的对策建议，为党委政府决策服务，为教育培训工作服务，使智力成果转化为实用的举措，推动党校事业迈上新台阶，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彰显新作为。

四、严格遵循管理服务规律特点，全面

提升“从严治校”整体水平

开展基本培训必须围绕服务学员、尽好职责、发挥优势展开工作。党校是传播真理力量的重要阵地，也是引领党内风气风向的重要阵地，必须加强校风校纪建设，使党校成为良好党风学风的“孵化地”，不良风气的“过滤器”，始终保持党校的良好声誉和形象。

一是培养过硬的班主任队伍。党校班主任是学员培训期间的直接组织者和实施者，代表着党校形象，是党校的“代言人”，是学员接触最直接、最频繁的“党校人”。班主任工作就是党校的“基层一线”，党校要让班主任岗位成为“练兵场”和“成长营”，努力打造一支政治强、业务精、作风硬的班主任队伍。党校的教育培训工作千头万绪任务繁重，班主任要善于用《条例》和《规划》规范带班的各项工作，把培训工作流程化、时效化，将教学、管理和服务有机融合，积极搭建平台，营造浓厚的党校“党味”，烧旺党性锻炼的“熔炉”，教育引导学员做坚定信仰、忠诚可靠、服务人民的模范。

二是积极完善学员管理制度。学员管理是干部教育培训的基础性工作。党校必须坚持把党性教育贯穿学员管理全过程，把“严”字贯穿干部教育培训始终，教育学员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和《干部教育培训管理规定》，不断自警自省，增强自律意识，树牢政治规矩。党校学员管理工作应建立科学的考评机制，完善考评方式，对学员的培训效果进行全面客观的评价。党校通过严谨的培训管理，教育学员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做到旗帜鲜明讲政治、把握大局识大

势，坚决不发表不当言论，不讲述无中生有、虚无缥缈的东西，始终保持政治信仰不变、政治立场不移、政治方向不偏。

三是精准提升服务保障质量。从严治校是党校事业高质量发展之基。党校要秉持“政治过硬、服务为本、保障教学”的理念，健全教学培训风险防控体系，明确教学管理等方面的安全责任，做到学员至上、礼貌热情、规范服务、周到细致，不断提高教学保障、餐饮供给、图书借阅等方面的服务水平，努力建设管理精细、服务高效的平安校园。在培训实践中，党校要坚持服务主责主业、保障中心工作的宗旨，探索科学化、精细化、规范化的保障模式，把严以治校融入教学科研、管理服务日常工作，坚持寓教于悟、寓教于思、寓教于行，真正让党校教育有情有理、有血有肉、触及灵魂，推动党校全面建设健康发展。

党校事业高质量发展，关键看担当，根本在落实。新时代新征程，党校要紧紧抓住基本培训任务要求，以开局就是决战、起跑就是冲刺的精神状态和饱满热情，坚守“为党育才、为党献策”的初心使命，实现思想强引领、队伍高素质、教学能创新、科研出精品、咨政促决策、成果进课堂的工作目标，不断增强党员干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本领，努力推动党校干部教育培训创新发展、提质增效。

作者系中共北京市西城区委党校二级主任科员

责任编辑：鲍淑红



固原市关于进一步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对策建议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提出，要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并就健全预算制度等作出重要部署。当前固原市正在加快建设宁夏副中心城市和生态文旅特色市，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对推动我市经济高质量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紧扣自治区党委十三届九次全会精神，在全面了解固原市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对策建议。

一、存在的问题

（一）经济总量和财源基础有短板。从经济总量来看，2023年，固原市地区生产总值437.1亿元仅占全区总量的8.2%，占银川市的16.3%。从重点税源来看，重点税源企业少且主要集中在以能源为主的采矿业、制造业，税收占比四成以上。全区纳税前100名企业中，固原市仅有王洼煤矿一家。从结构看，多数产业处于产业链的前端、价值链的低端、创新链的末端，同时重点税源企业、

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不多，税收的经济支撑力较弱。从级次来看，2023年，固原市有4个县区财政自给率低于5%（隆德县3.3%、原州区3.5%、西吉县3.6%、泾源县3.7%）。

（二）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待提高。多年来，固原市戴着“资源禀赋差”的帽子，在寻求产业发展与争取上级转移支付的战略思维中，缺少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推动固原市产业和税源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魄力。一方面，财源建设办法不多、动力不足，各级国有企业总体经营情况不佳，企业发展从寻求财政补偿和帮助的角度较多，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考虑较少，自身动力不足。另一方面，各部门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的措施不多，依旧过多的靠争资金、争项目来做大地方财政，但转移支付资金中均衡性转移支付资金少，“戴帽下达”的共同事权转移支付占比较大，对加大地方自主发展作用不大。

（三）预算编制程序和机制存不足。一方面，部分部门（单位）对全口径预算认识不到位，存在“小金库”的思想，将事业性收入或经营性收入未全额纳入预算管理，欲在预算盘子之外列支；同时，受县属国有企业资本薄弱，运营困难等现状，县（区）暂未编制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另一方面，因缺少上位法和相关规定明确，审计、巡视等部门与财政部门对政策解读不一致，部分资金未纳入财政收入，且有一定审计风险。如2023年，上级在检查时发现，市本级将新闻传媒中心上缴的广告费纳入非税收入管理，但检查时被认定为虚增财政收入。

（四）财政资金投入与产出差距大。从

2023年政府综合财务报告来看，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资本性支出为77.76亿元，占总支出的28.07%；市本级资本性支出为14.52亿元，占总支出的28.05%。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一是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的费用类支出占比达70%以上，财政投入与产出失衡；二是会计核算口径不统一、会计处理不完整等原因，造成财政拨款支出中的资本性支出资金远高于单位账务中固定资产、在建工程、公共基础设施账务核算资金；三是部分单位将符合条件的资本性支出费用化，同时重资产投入、轻权益挖掘，“政府建设、企业收钱”的现象普遍存在。

（五）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不均衡。自治区与市县，部分事权与支出责任界定不够合理、不够规范统一，如按“采取按照比例或给予适当补助”等方式承担支出责任，支出责任与事权不完全匹配，可操作性不强。市与市辖区，存在部分领域事权划分较为笼统，如科技、交通、环保、应急等支出责任不够明晰，资金保障不到位，市与辖区两级政府都怨声载道。市与县，宁夏实行“区直管县”的财政体制，市委和政府行使公权力时存在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不匹配的问题，如应急救援、安全生产等事项的职责在市级，但市级无资金统筹权利，使地级市处于有责无权的困境。

二、意见建议

（一）以经济发展为核心，增加地方自主财力。积极争取自治区财源建设奖补资金，加大新兴税源产业培育力度，推动当地特色产业向规模化、融合化、链条化延伸，向市场化、品牌化、有税型发展，改变单一的

税源依赖状况。二是调动行业主管部门培植重点税源产业积极性，在推进招商引资、产业项目建设时，更加注重税收贡献，强化投入产出理念。三是全面落实中央和自治区各项税费优惠减免，切实发挥重点税源企业联系服务机制作用，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助力企业渡过难关。四是加强财税部门协调配合，加大税费征管力度，将应征的征到位、应减的减到位，确保颗粒归仓。五是积极对接自治区做好税制改革事项，提出合理化建议。

（二）健全预算管理制度，提高财政管理水平。一是进一步健全完善现代预算管理制度，督导相关部门全面贯彻落实全口径预算，坚持无预算不支出的原则。二是推行零基预算改革，探索将财政支出分为法定支出和非法定支出，对非法定支出实行零基预算，打破原有的固定支出，集中财力办大事。三是加强事前、事中监督，建立风险预警机制，对30万元以上的预算项目实行事前评估，及时发现和防范财务风险；同时会同发改等项目主管部门，加强财政承受能力评估，未开展或不通过财政承受能力评估的项目，一律不予安排。四是加强财政财务管理，督促陈旧资产入账，及时校正财政总预算、资产管理系统及预算单位账务的数据衔接和比对，不断降低财政投入与产出比例。五是建立全口径地方债务监测监管体系，有序化解存量隐性债务，落实地方政府举债终身问责制和债务问题倒查机制，严格对违规违法举债问题监督问责曝光，确保完成各项化债目标任务

（三）理顺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发挥

积极性。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要求“进一步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市财政将按照市委和政府安排部署，认真梳理市与市辖区权责清单，稳妥解决市与市辖区主要争议事项事权和支出责任不清的问题。积极争取自治区将市县资源勘探领域安全生产及道路、矿区塌陷治理等支出责任由中央和自治区承担（市县缴纳的资源税全部为自治区级收入、矿产专项收入为中央和自治区共享收入）。按照中央和自治区改革进程，逐步深化公安、市场监管等领域事权改革方案，明确市与市辖区政府支出责任。

（四）积极做好改革承接和有利政策争取工作。及早部署、尽早研究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下划地方具体措施，为争取有利政策和后续改革承接工作做好充分准备。根据国家消费税改革动向，会同税务部门全面测算我市消费税税收数据，认真研究税目调整、征收环节、比例下划等各方面情况，全面分析有利不利因素，积极向自治区提出适合我市经济发展的消费税改革建议。全面调研了解我市消费税涉税企业发展情况，会同税务部门积极研究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改革下我市消费税税源涵养对策建议。

作者系新任职处级领导干部进修班学员
邵 菁、马 宁、马佐龙、海万福、方小宇、
曹 祥、余广乾、王 真、马天东、张迎春
责任编辑：鲍淑红

关于深化固原市生态文旅特色市建设 推进机制领域改革的对策建议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支持生态优势地区做好生态利用文章，把生态财富转化为经济财富”。近年来，我市立足资源禀赋、发挥比较优势，着力生态文旅特色市建设，通过构建生态文旅特色市建设组织保障机制、优质生态文旅产品供给机制和生态环境资源长效保护机制，统筹生态、文化、旅游“三篇文章”，推进生态“六项行动”、文化“四项工程”、旅游“六项计划”重点任务，很好地满足了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优秀文化供给、优质旅游服务的需求。截止目前，原州、西吉、隆德、泾源已成功创建全域旅游示范县，全市打造培育4A景区7家，打造国家级旅游精品线路19条，创建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镇15个、自治区特色旅游村镇29个，六盘山、泾源县成功创建国家级“避暑旅游目的地”，固原市先后荣获中国最具魅力宜居宜业宜游旅游城市、最美中国·文化旅游民俗（民族）风情目的地城市、全国十佳生态休闲旅游城市、中国绿色生态旅游城市、全域旅游创建典范城市、第

四批国家旅游标准化示范市。

但现有运行机制在推动生态文旅特色市建设方面取得一定成效的同时，仍存在一些较为突出的问题，影响了生态文旅特色市建设步伐，制约了固原生态文旅融合发展。

一、存在问题

（一）专项规划滞后。在“文旅+百业”宏观背景下，尽管建设生态文旅特色市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其重要性也已上升到市级发展战略。然而，在实际操作层面，市委、政府层面缺乏一套具有前瞻性、系统性和指导性的专项规划，导致各县区在推动生态文旅特色市建设过程中各自为战，难以形成拳头产品、特色品牌和整体竞争优势，诸如类似沙坡头旅游区星星酒店、黄河宿集等能够领跑全国的头部企业和项目比较稀缺，示范带动效应不够充分，未能形成产业发展集群，建设效率也因此大打折扣。

（二）协同作用不够。建设生态文旅特色市是一项综合性、系统性工程，关涉多个部门，横跨“一、二、三”产业广泛领域，



紧密关联“吃住行游购娱”众多要素。《关于加快建设生态文旅特色市的实施意见》要求构建职责部门联席会商和市县联动协调机制，但在实际操作中，缺乏高效、统一的联席会商及协调机制，部门之间、县区之间资源调配难以形成合力，致使重要旅游资源“部门分割、条块分割、区域分割”现象比较突出、权属关系复杂，缺少有效整合、系统开发和集团化运营，限制了生态文旅融合发展深度、广度和效度。

（三）市场政策需优化。生态文旅产业的审批和监管涉及文旅、商务、市场监管、公安、消防等多个部门，部分新兴文旅业态的市场准入要求过高，限制了文旅产业的规模发展。以乡村民宿为例，由于多数乡村民宿为自建房屋改造，无法达到消防验收合格

标准，导致乡村民宿经营证照无法办理，影响了民宿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应当结合生态文旅特色市建设需要，在文旅产业市场准入等政策方面列出政策简化清单，优化证照办理流程。

（四）市场主体参与度不高。促进生态文旅特色市建设，需要市县财政的专项支持，也需要鼓励支持市场资本、民间投资等多元投入，特别是需要一批具有创新能力和竞争力的市场主体来推动。然而，由于市场主体培育与激励机制不尽健全，加上有关生态文旅特色市建设的宣传不到位，使得市场主体特别是中小文旅企业缺乏参与生态文旅特色市建设的动力，这不仅限制了固原生态文旅产品和服务的多样性，也影响了生态文旅特色市建设的整体质量和效益。

(五) 基础设施相对薄弱。就我市而言,目前还处于景点旅游与生态休闲旅游共同发展阶段,景区建设的短板依然是文化旅游发展中急需解决的问题。吃住行游购娱等要素尚未形成体系,景区景点、旅游示范村道路、服务中心、停车场等公共设施配套还不到位、运维管理还不规范。

二、改革方向及措施

着力推动生态文旅特色市建设体制机制改革,是推进建设好生态文旅特色市的重要举措,也是让“生态+文旅”成为推动固原文化旅游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必须围绕固原绿色、红色、古色、特色资源优势,以全市“一盘棋”的大局观念和种好“责任田”的使命担当,创新沟通协调机制,加强区域横向协同创新,加大上下纵向联动力度,努力将固原打造成为西部地区独具特色的国家级生态旅游度假区。

(一) 健全顶层设计与引导机制。完善生态文旅特色市建设推进机制,首要任务是健全完善政策和规划引导体系。市委、政府层面应尽快出台系列支持政策文件,深入阐述建设生态文旅特色市的战略意义,明确重点支持领域与方向,提出具体政策保障措施。与此同时,结合“十四五”规划的总结评估和“十五五”规划的前期谋划,着手制定“十五五”时期全市生态文旅融合发展专项规划,明确固原生态文旅融合发展的目标、主要任务及实践路径,进一步深化和巩固生态文旅特色市的建设成效。

(二) 健全统筹协调与共建机制。在生态文旅特色市建设中,资源的有效配置和整

合至关重要。市县两级应强化生态文旅特色市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职能,着力打破行政壁垒,建立跨区域、跨部门、跨行业协调机制与联席会议制度,加强重大项目、重要政策和重大事项的协商,加强固原生态文化旅游资源的共同保护利用,统一布局建设生态文化旅游产业项目,进一步推动固原生态文旅产业的县域联动、资源共享和信息互通,不断提升固原生态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合力。

(三) 健全要素投入与保障机制。建立包括财政补贴、税收优惠、金融支持、创新奖励等在内的一系列政策激励机制,鼓励宁夏六盘山旅游集团有限公司等国有文旅企业发挥引领作用,在文旅项目建设、产品开发等方面投资兴业,带动各类文化旅游企业和市场主体投身生态文旅特色市建设,有效解决生态文旅特色市建设资金短缺问题。建立健全生态文旅融合发展人才培养激励机制,支持培养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创意、艺术表演、文化旅游高层管理等专业人才,为生态文旅特色市建设提供强有力的人才保障。

(四) 健全品牌建设与示范机制。充分发挥示范创建引领作用,全力推进六盘山红军长征旅游区成功创建国家5A级旅游景区,培育打造六盘山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争取须弥山旅游区进入国家5A级旅游景区培育名单,力争成功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市,以示范效应助力生态文旅特色市建设。围绕六盘山生态文旅特色品牌,继续办好六盘山山花节、宁夏红色文化旅游节等品牌文旅节会,进一步扩大知名度和社会影响力,进而

打造1-2个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六盘山文化旅游活动。大力发展具有固原特色的生态文旅产业，围绕生态休闲、旅居康养、红色研学、乡村体验等旅游产业，构建沿六盘山生态文旅产业廊道和宁夏南部地区生态文化旅游精品线路，努力形成完整高效的生态文旅产业链。

（五）健全交通互联与畅行机制。加强景区及周边基础设施建设、装备支撑、科技赋能，衔接“铁公机”立体网，加快融入全国高铁网，加密国内航班航线，推动旅游景区景点并入、连接高速以及国省干道，开通核心景区、旅游特色村镇旅游专线，着力构建“快进慢游”畅行网。加快推进国家5A级旅游景区、全域旅游示范市创建，打造宁夏六盘山国家级旅游度假区。

（六）健全资源开发与增效机制。探索

建立政府与国内优质企业联合打造旅游景区新机制，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通过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全力实施培根铸魂等“四大工程”，统筹吃、住、行、游、购、娱，深入推进品牌固原等“六项计划”，围绕全域旅游示范区、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民宿经济先行区等示范创建，吸引国内优质企业投入资金、技术等参与旅游资源开发建设和旅游项目运营，不断提高旅游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

作者系新任职处级领导干部进修班学员
罗江东、柳睿、黄小鹏、杨宏伟、王浩、
马宏选、刘永年、马玉明、邓萍、马宝成
责任编辑：孔晓



莲花沟，长征路上一条通往胜利的红色通道

◆ 苏明珠

莲花沟，位于固原市原州区张易镇王套村，沟道全长3.6公里，可直接通往六盘山顶。莲花沟，虽然不是翻越六盘山的唯一沟道，但这条沟道却是快速翻越六盘山通往青石嘴的一条捷径。莲花沟附近还有开城沟、段才沟、石窑沟、甘沟、化沟等沟道均能到达六盘山顶，但这些沟道狭窄且陡，不便红军辎重运输，而莲花沟过去是一条商贸古道，沟道较为宽敞，车马均能行走，相比其它沟道不仅距离最短而且便于大部队行动。

1935年9月22日，北上中央红军在甘肃省宕昌县哈达铺关帝庙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简陕甘支队称），彭德怀担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辖三个纵队约7000多人。10月5日，陕甘支队兵分两路，右路一纵队在林彪、聂荣臻的率领下，由静宁县界石铺高家堡子一带出发，进入今宁夏西吉单家集、兴隆镇一带宿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随右路一纵队行军；左路二、三纵队主

力由彭德怀、周恩来等率领，于同日抵达公易镇（今属西吉县兴隆镇），在上村、新合庄、撒家湾、阎家湾、西冶等村宿营。10月6日，右路一纵队从驻地出发，经新店子、什字路、杨家磨、黄蒿湾等地，下午2时左右到达今固原原州区张易堡一带宿营；左路二、三纵队主力从公易镇出发，经兴隆镇、北堡子、红城子等地，下午到西吉马莲川至张易堡一带。全军宿营在张易堡、阎官大庄、田堡、盘龙坡、王套、马莲川、马蹄沟及周边村庄，左右两路红军分别对周围战略要口严密把守。

10月6日，陕甘支队在马莲川和张易堡一带集结宿营后，看似平静实则危机四伏，不知不觉疲惫不堪的红军已经陷入非常危险境地。

从地势上看，红军宿营地位于沿马莲川河长约25公里地带周边村庄，地形开阔，道路通畅。北面直通固原，南面毗邻什字、隆

德，西面连接将台堡、西吉，而将台堡又是交通枢纽，东面是巍峨雄壮的六盘山，因其地势险要形成一道天然屏障，也就是说红军处在三面开放一面封堵的狭长地带，一旦被敌人夹击包围，后果不堪设想。

从敌情上看，红军进入甘肃、宁夏后，国民党气势汹汹穷追不舍，企图最后“歼灭”红军。1935年9月26日，国民党在西安成立了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蒋介石亲任总司令，张学良任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权，指挥陕甘宁青4省国民党军队的“剿共”作战。陕甘支队巧渡渭河突破敌人封锁线后，蒋介石急调兵遣将，除加强平（凉）固（原）封锁线外，又在西（安）兰（州）公路静（宁）会（宁）段设置封锁线，企图阻截陕甘支队向陕甘苏区靠拢。蒋介石亲自给国民党三十七军军长毛炳文发电，要其“使尽全力确保两宁（静宁、会宁）、定西封锁线，以树最后‘歼灭’共军之功。”毛炳文又紧急命令下属第八师师长陶峙岳和第二十四师长黄子成“跟踪穷追，期在静宁、海原、固原间协同友军歼灭该匪”。10月6日，红军离开单家集、兴隆镇大约3小时后，国民党飞机投掷7枚炸弹，其中一颗炸弹落在了陕义堂清真寺附近，距离毛主席宿营的房子只有几步之遥。毛炳文部第二十四师副师长李英率领4个团沿西兰公路追至沙塘、隆德一线，企图截住红军向南入西兰公路东进之路。陶峙岳第八师向超中第二十二旅三个团沿兴将路（兴隆镇至将台堡）追至将台堡张崖燕与红二纵队对峙，两军相距不到10公里。同时国民党甘肃省东路交通司令马锡武部骑兵所属王子良团驻守隆德。

据国民党陆军第三十七军追剿毛、彭股匪战斗详报称：十月六日，我第八师向旅先头到达兴隆镇北之谢家东坡，将匪之掩护部队截击，匪即狂窜。探悉，匪分两股逃窜，一经将台堡向马莲川，一经十（什）字路向张易堡逃窜。该旅继向将台堡搜剿前进。黄昏时，与匪在张乃燕接触。我二十四师刘团，尾追至马家嘴，主力追到沙塘铺。王骑兵团进抵隆德城。国民党东北军何柱国骑兵第七师门炳岳部进至平凉到固原公路和彭阳到青石嘴公路一线防堵红军向陕北前进，其师部和第二十一团驻瓦亭，第二十团驻牛营子，第十九团两个连驻守在青石嘴，团部和其它连队驻守在彭阳古城等地，妄图凭借六盘山天然屏障消灭红军于六盘山下。张易堡北面固原、杨郎、三营等地驻有国民党马鸿宾部队两个团，马鸿宾部另一支部队正在从西峰沿河古道（彭青路）向固原开进。据10月6日马鸿宾关于堵截陕甘支队致邵力子电：奉朱总司令电，令飭向固、海方面堵截，何军长已抵西峰。宾即调集所部，分途出发。诚一如能协同各部，断其与徐、刘各股联络，再能于陇东区域消灭，是为万幸。

10月7日，国民党二十四师副师长李英和甘肃交通司令马锡五率部由南向北从隆德方向开到野鸡岷、马家店、后新庄一带紧逼什字、贺套、莲花沟等地红军驻地。国民党第八师二十二旅旅长向超中从将台堡向马莲川红军追来，红军留下后卫部队在阎官大庄、张易堡子梁和莲花沟等地阻敌，边打边撤掩护主力红军翻越六盘山。关于国民党围堵形势，时任红一纵队侦察科科长刘忠后来这样回忆：通过六盘山的这一天，情况十分紧

张，国民党毛炳文部二十四师进到了隆德、静宁，马鸿宾部进到了会宁附近，我们前进路上的平凉、固原等地有东北军、西北军占领着。通过平宁公路，首先就要通过有名的天险六盘山。从当时的情况看，红军在自身力量非常薄弱（全军仅有7000多人）的情况下，又处在前有大山阻路，后有敌兵穷追不舍，左右受到敌人夹击威胁的危险境地，稍有不慎，不但无法到达陕北实现中央北上抗日的战略主张，还将会面临被敌人合围在六盘山下的危险，关系到中国革命和红军的前途命运。

从中央应对措施上看，面对国民党部队步步紧逼，陕甘支队积极采取应对措施保证中央和红军安全。10月5日下午19时半，彭德怀截获敌人电报后及时致电毛泽东通报敌情：敌毛炳文电令陶峙岳、芦××两师，努力跟踪穷追毛、彭两股，期在海×周×〔疑指海原、固原一笔者注〕间协同友军歼灭。又电陶师长率曾旅缺一团于六日跟我进，指挥各部穷追；又电二十四师李副师长，毛、彭所有匪众经我方防堵化〔北〕窜，刘团在静宁休息数日后，特组轻击队跟踪猛追，大队续进。功益〔指公易镇一笔者注〕群众说，固原有马敌〔指马鸿宾一笔者注〕两团，又毛敌两团尾我于黄昏前到功益镇西端十里处向我两翼运动，有于明晨进攻模样。敌轻视我军，如小部尾追，应乘敌不易〔意〕集结支队主力于〔马〕连山地域打击敌。6日下午16时，毛泽东等致电彭德怀通报红一纵队宿营地及其它情况。

17时半，彭德怀致电毛泽东通报敌情并建议在马莲川打击敌人后袭取固原：毛炳文

本人及二十四师三个团原在蔡家铺，七日均到静宁。朱绍良电某骑兵团归二十四师指挥，协同追剿。毛部向旅本日向某处前进，尾我二纵队之毛部两团本午到常家集〔指单家集一笔者注〕北端，十七时进抵离马连山十里处。固原有马某部两营固守，并闻今、昨有到兵数团说。……二、三纵队以相机袭固原之目的，……待敌通过马连山，一纵队从十字路向北打，二纵队迁出马连山以北向南打，干部营诱敌急追，以期消灭该敌。毛泽东通过掌握的情况意识到形势非常严峻。毛泽东坚持“尽量避免同国民党军队作战，要迅速到达陕北集中”的行动方针。当晚20时半致电彭德怀，详细通报“明日军事行动计划”，指出一纵队派出两支部队在穆家庄、什字路担任警戒任务，红军其余全部主力均经张易堡王套，沿莲花沟翻越六盘山向青石嘴进军。21时，毛泽东回复彭德怀计划“袭取固原”电报，指出“两三日无求战之必要”并要求部队“均向青石嘴东进”，以求快速脱离敌人围追，说明当时在毛泽东眼里红军没有胜算的把握而且形势十分严峻。7日凌晨1时左右，陕甘支队全部主力（警戒部队除外）从驻地出发，沿莲花沟向六盘山进军。据杨定华回忆，晚上战士们都感到疲劳，准备好好睡他一会。忽然在夜里十时，老百姓来报告，距我们驻地十五里地发现了敌人。……于是就命令各部十二时烧好早饭……凌晨一时又继续出发，目的只求得迅速脱离敌人的追击。

林伯渠在日记里也记载了这一天的出发时间：十月七日，云。早一时行，行约七十里，到清上咀〔笔者注：青石嘴〕附近之挂



马沟宿营。红一纵队第十三大队担任后卫警戒任务，按照邓飞回忆，陈赓、邓飞率领第十三大队一部在莲花沟阻敌直到中午12点后，才撤离指定位置。又据张易王套村村民张来军说，张易的老人们过去都说在莲花沟进入沟口不远就有人发现打仗留下的弹壳。另据国民党陆军第三十七军追剿毛、彭股匪战斗详报称：据陶师长详报，我向旅先头之四十八团，于昨晚四时许，向将台堡东侧高地之匪进击。……至本日拂晓，以四八团任左翼，以四五团任右翼，向马莲川、张易堡附近之匪攻击。以四四团为预备队，随右翼队跟进。匪仍顽强抵抗，激战二小时，匪仓皇东窜。我四五团尾匪追击，匪又节节顽抗……据李副师长虞申电称：本师遵令迂回截击，本午经隆德到达野鸡岘、马家、后新庄及隆德沟之线。同时据王骑团报称，匪大股已到张易堡、王家套子附近。比饬许旅急进至王家套子附近，占领阵地，彭旅续进。未刻，协同王骑团，将匪截为两股。一窜六盘山，一股向香炉山北窜。沿途死尸枕藉，极为狼狈。请飞电固原驻军，向西北堵剿，此股不难歼灭也。国民党战报中的时间和“战

果”不排除误差和虚报成分，但能从另一个角度反映红军当时在张易堡、莲花沟一带的危险境况。7日上午，陕甘支队翻越六盘山到达青石嘴附近，先头部队发现国民党东北军骑兵第七师十九团运送给养的两个连刚到青石嘴，正准备休息用饭。毛泽东接到情报后决定消灭这股敌人并亲自指挥部署，红一纵队第一、四、五三个大队出其不意形成钳形包围态势一举歼灭敌人两个连。青石嘴战斗后，国民党第二十二旅向超中部追敌和东北军增援部队与我军陈赓、邓飞率领担任后卫的第十三大队在青石嘴遭遇，红十三大队在上青石桃树湾英勇阻敌，完成掩护主力部队行进任务并越过平固公路，突破国民党长征路上最后一道封锁线（平固公路）。此后几天，国民党东北军何柱国部、第三十七军毛炳文部和第三十五师马鸿宾部在红军身后紧追不放。

莲花沟和长征路上著名的“大渡河”“泸定桥”“腊子口”一样成为红军生死存亡的重要关口，党中央和7000多名红军将士从这里翻越六盘山成功摆脱危局，从这个意义上讲莲花沟是一条长征路上承载着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红色通道。

作者系固原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责任编辑：单娟娟

《六盘山论坛》征稿启事



《六盘山论坛》（季刊）是宁夏六盘山干部学院 中共固原市委党校主办的连续性内部资料。主要栏目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理论探索、宁夏党史研究、延安精神研究、探索实践、宁夏史话、文艺作品赏析等。欢迎广大机关单位领导干部、各界专家学者、党校、干部学院同仁不吝赐稿。

一、来稿须知

- 1.题目：稿件题目应准确无误地表达论文的中心内容，20字以内为宜；
- 2.摘要：稿件正文前要有200字以内的中文摘要；
- 3.关键词：稿件正文前要有3-5个中文关键词；
- 4.正文：稿件观点鲜明、数据可靠、文字精炼、结构严谨，篇幅以5000字左右为宜；
- 5.作者简介：每篇稿件都应注明作者姓名、工作单位、职务或职称、研究方向、通讯地址、邮编、联系方式、电子邮箱；
- 6.基金项目：请于稿件首页注明来源、名称及编号；
- 7.注释、参考文献：要核对准确，均采用尾注上标格式，序号分别为①②③……和[1][2][3]……

二、关于参考文献

- 1.专著论文集、学位论文、研究报告格式：[序号]作者.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识]，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起止页码（专著的文献类型标识为M，论文集的文献类型标识为C，学位论文的文献类型标识为D，研究报告的文献类型标识为R）；
- 2.期刊文章格式：[序号]作者.文献题名[J].刊名，年，卷（期）；
- 3.报纸文章格式：[序号]作者.文献题名[N].报纸名，出版日期（版次）；
- 4.论文集中析出文献格式：[序号]析出文献主要责任者.析出文献题名[A].原文献主要责任者（任选）.原文献题名[C].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析出文献起止页码；
- 5.电子文献格式：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识/载体类型标识]. 出处或可获得地址，发表或更新日期/引用日期；

三、关于编辑与采纳

- 1.本编印单位对来稿有删改权、作者若不同意，请在投稿中予以说明；
- 2.文责自负，切忌一稿多投、严禁抄袭、剽窃，否则由投稿作者承担全部后果；
- 3.稿件以电子邮件（word文本）形式发送至编辑部电子邮箱。审稿周期为一个月左右，文章一经采用，刊发后即赠样刊一本；自投稿之日起，如果三个月内未收到刊用通知，作者可自行处理。

四、联系方式

投稿邮箱：lpslt@126.com

投稿地址：宁夏固原市原州区安康路2号

邮 编：756000

联系电话：0954-2065708